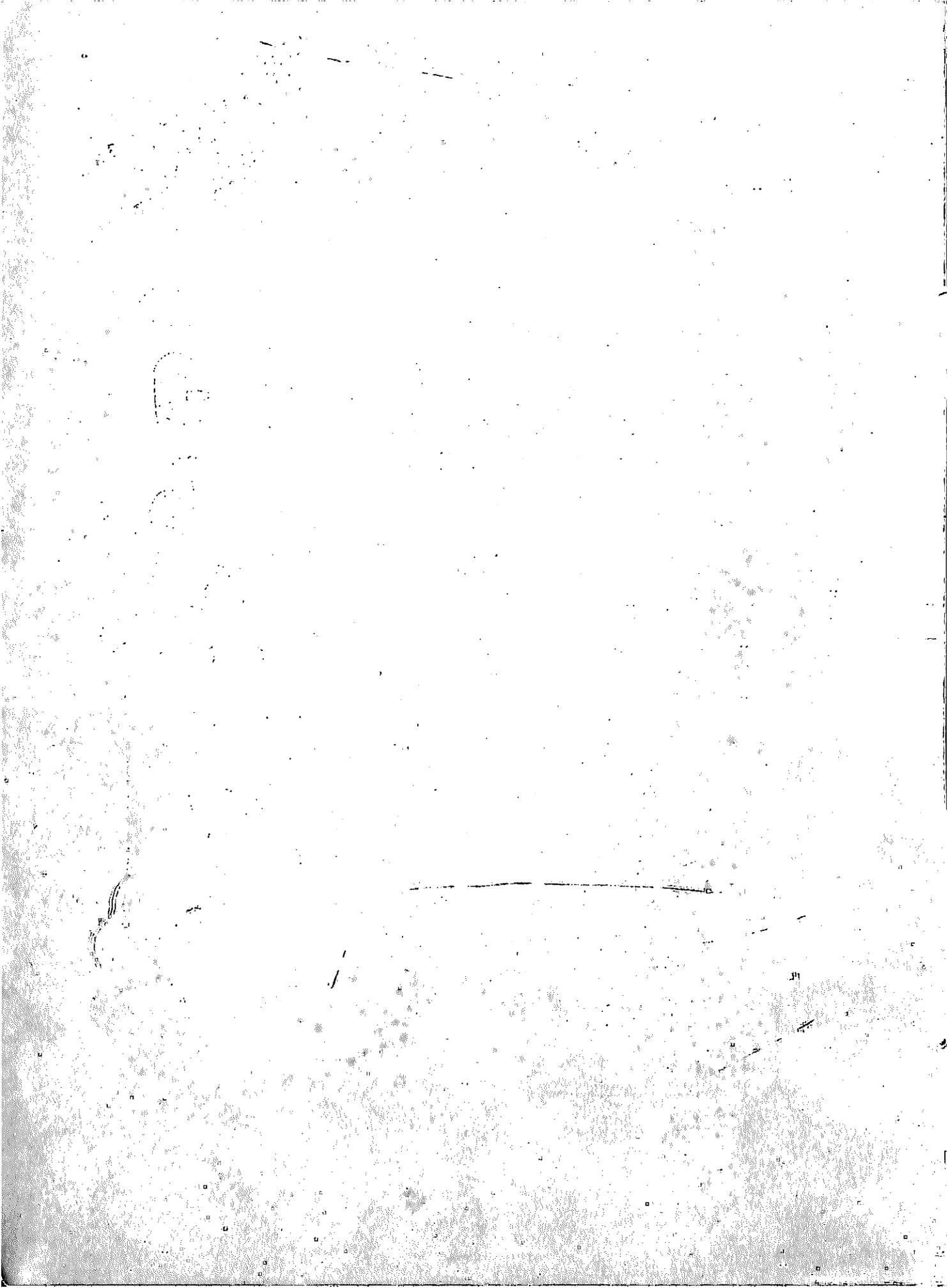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2

1975



# 毛主席语录

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  
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3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 (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 4 )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 张春桥 (12)

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 ( 22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新闻公报 …………… ( 23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 ( 2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 ( 2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 ( 28 )

## 在斗争中努力学习

### 加强革命团结的保证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 …方 海 (30)

《国家与革命》和叛徒布哈林 ……………上海吴淞化工厂工人 余惕君 (34)

### 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学习《国家与革命》的一点体会 ……………辛 彬 (37)

抓好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 ……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党总支委员会 (40)

##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 评淮西之捷

——读《旧唐书·李愬传》 ……………罗思鼎 (43)

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红 宣 (49)

### “九州生气恃风雷”

——《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 ……………陈旭麓 (54)

### 沈括和《梦溪笔谈》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二 ……………韩天宇 王国荣 (61)

对《论淝水之战》的几点意见(读者与编者) …………… (65)

## 经济问题研究

### 战天斗地的杰作

——记上海郊区八百个粮食亩产二千斤以上的高产队

……………凌 岩 袁夏良 (66)

### 医疗器械用上了先进的技术成果

——上海市发展精密医疗器械工业的调查

……………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72)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续一) ……………陶友之 (76)

### 国际扒手的真相

——评最近两年苏修对外贸易 ……………上海师大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戚士毅 (81)

阿拉伯国家石油斗争的前前后后 ……………秦正先 (85)

杂文：“小锅菜”里有大方向 ……………陈熙春 (92)

观招牌有感 ……………蔡 青 (93)

西双版纳来信(续完) ……………吴文虎 姚纪梅 (94)

#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文件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经大会一致通过。现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 目 录

- 序 言
- 第一章 总纲
-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国务院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 序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

二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

我们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我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国内外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第一章 总 纲

**第 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 二 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 三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 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 五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

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第六 条** 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七 条**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 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

**第九 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 条** 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十 一条** 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第十二 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四条** 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

## 第二章 国家机构

###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组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特邀若干爱国人士参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特殊情况下，任期可以延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

**第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

## 第二节 国务院

**第十九条**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人员组成。

**第二十条** 国务院的职权是：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和全国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地区、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农村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并报上级国家机关审查批准。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本地区内，保证法律、法令的执行，领导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审查和批准地方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决算，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它的自治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任免。

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公民的崇高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二十七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国家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

###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三十条** 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首都是北京。

#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一月十七日通过)

张 春 桥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发给各位代表。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作一些说明。

二十年前，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一九五四年宪法，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总结了历史经验，巩固了我国人民的胜利成果，为全国人民规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前进道路。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宪法是正确的。它的基本原则，今天仍然适用。但是，一九五四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部分内容，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总结我们的新经验，巩固我们的新胜利，反映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主要任务。

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的新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同国内外敌人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经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

的原则,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九大、十大都再次肯定了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还是改变这条基本路线。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都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的神命线。只要我们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

现在提出的这个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是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反复讨论产生的,是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产物。序言是新写的。条文从一百零六条,缩减为三十条。重要的修改,有以下几点:

(一) 修改草案从序言开始,记载了我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写进了修改草案总纲。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由于不设国家主席,草案对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这些规定,必将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

(二) 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又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政策。在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的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实行革命三结合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也

分别写进了修改草案。这样,就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各个阶级在我们国家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一贯教导我们:“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器”。我们的草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原则立场,同孔老二的什么“仁政”,同苏修叛徒集团的什么“全民国家”之类的谬论划清了界限。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它是我国人民战胜敌人、保护自己的法宝。我们必须很好地爱护它,不断地加强它。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加强国家机关的建设。要继续巩固工人阶级和它的可靠同盟军贫下中农的联盟,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发展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独立和安全。

(三) 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对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修改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又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其中特别规定了各兄弟民族和妇女的权利。修改草案还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同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内容。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规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 一九五四年宪法提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国人民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规定我国现阶段主要有两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修改草案对于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对于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刘少奇、林彪包产到户、取消自留地之类的荒谬主

张划清了界限。

修改草案重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应当指出，在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象初升的太阳，还很年轻。它是在斗争中诞生的，也只能在斗争中成长。就拿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许多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无产阶级的扫帚不到，这类垃圾决不会自动跑掉。修改草案关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纠正不正之风等项规定，就是要我们十分注意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阵地。

(五) 根据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我们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写上了修改草案，表示我们国家今天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要永远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各位代表！

修改宪法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五年。这次大会将要完成这项工作，公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法。这是一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的大事。长期以来，为了争取和捍卫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权利，为了粉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妄图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卖国的阴谋，为了战胜国内外反动派，我国人民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千成万的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这些斗争的胜利，产生了这个社会主义宪法。我们相信，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一定会认真地执行这个宪法，勇敢地捍卫这个宪法，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周恩来

各位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巩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各位代表！

我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阐明了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

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各级领导班子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积极培养青年、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能上能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

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各位代表！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世界上到处讲缓和、讲和平，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对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我们支持西欧国家在这个斗争中联合起来。我们愿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为增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

边界武装冲突。他们背弃中苏两国总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达成的谅解，拒绝签订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内容的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致使中苏边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他们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连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防止武装冲突这样的事情都不干，却侈谈什么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条约，这除了为着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奉劝苏联领导，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保持警惕，加强防御，准备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全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战备。要认真办好民兵。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各位代表！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大事，抓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

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

我们必须发扬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通过)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认为，从三届人大以来，国务院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会代表深信，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第一次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主席台上悬挂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边树立着鲜艳的红旗。大会选举了由二百一十八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吴德为秘书长。

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还有：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许世友、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

朱德委员长宣布大会开幕，全体代表热烈鼓掌。乐队奏国歌。

会上，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从一月十四日起，全体代表认真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上述两个报告。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全国经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反复讨论，共选出

代表二千八百八十五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他们当中有产业工人、农民、其他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的代表。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五十四个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十二名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许多代表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兴旺气象。

大会正式开幕前，从一月五日到十一日举行了预备会，全体代表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

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大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欢欣鼓舞、紧密团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气氛。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一月十七日，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张春桥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为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会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经过认真讨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当宣布选举结果和任命名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代表们兴奋地表示，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今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任务，选举和任命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这一切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底的共同愿望，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我国的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执行和勇敢捍卫新的宪法，努力实现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大会指出,全国人民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要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争取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

大会指出,当前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各国人民对于世界大战必须有所准备。大会强调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主席团(共二百一十八名,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盛	于会泳	千比	马天水	马正寿	马宁	马惠敏(女)
王大任	王凤恩	王六生	王必成	王芸生	王克强	王洪文
王维俭(女)	王敬美(女)	王淦昌	王淮湘	王震	邓小平	邓兆祥

邓初民	邓颖超(女)	韦国清	木沙·司马义	尤太忠	贝时璋	
牛学智	牛乾一	毛远新	乌云其其格(女)	乌兰夫	方毅	
巴桑(女)	叶剑英	田富达	史良(女)	白如冰	白迪·海山	
邝健康(女)	冯友兰	皮定均	吕玉兰(女)	吕美英(女)	刘大年	刘大杰
刘子厚	刘文辉	刘庆棠	刘光涛	刘兴元	刘声	刘伯承
刘建勋	刘斐	江青(女)	江渭清	朱永嘉	朱光亚	朱蕴山
朱德	乔冠华	乔晓光	伍禅	任荣	许世友	许德珩
华国锋	华罗庚	庄则栋	庄希泉	汤一介	孙玉国	孙衍坤
孙鸿志(女)	严济慈	苏和	苏振华	杜琼书(女)	杨木兰(女)	杨立如
杨光	杨坡兰(女)	杨荣国	杨勇	杨得志	肖劲光	吴玉英(女)
吴有训	吴桂贤(女)	吴德	吴耀宗	何生祥	余秋里	邹清蓉(女)
辛志英(女)	沙千里	沙马力汗(女)		沈雁冰	宋长庚	宋庆龄(女)
宋佩璋	陈云	陈永贵	陈永祥	陈先瑞	陈逸松	陈望道
陈淑清(女)	陈锡联	李大章	李井泉	李世英	李世荣	李达
李光庆	李志民	李先念	李丽(女)	李顺达	李素文(女)	李强
李瑞山	李德生	张凤玲(女)	张平化	张宗逊	张春桥	张铁生
张越男(女)	张鼎丞	张福财	阿沛·阿旺晋美	茅以升	林巧稚(女)	
林丽韞(女)	林岳川	林耀华	果基木古	罗叔章(女)	帕巴拉·格列朗杰	
季方	金秀清	金祖敏	周兴	周叔弢	周建人	周恩来
冼恒汉	屈清华	孟继懋	赵朴初	赵辛初	赵紫阳	荣毅仁
胡子昂	胡清碧(女)	胡厥文	胡愈之	侯隽(女)	费彝民	姚文元
姚连蔚	秦基伟	袁水拍	聂荣臻	晋桂香(女)	钱学森	倪志福
徐廷泽	徐向前	徐致祥	徐清秀(女)	徐静洲	郭公举	郭沫若
曹轶欧(女)	戚玉珍(女)	常维华	崔海龙	康生	康健民	梁必业
梁祥胜	彭冲	董双琴(女)	董必武	董加耕	董其武	蒋锡明
韩先楚	覃应机	粟裕	傅玉芳(女)	童第周	鲁瑞林	曾绍山
曾思玉	谢冰心(女)	谢拴贵	谢静宜(女)	瑞板	蓝荣英(女)	蓝盛花(女)
路希杰	筱文艳(女)	解学恭	蔡畅(女)	廖志高	廖承志	赛福鼎
谭余保	谭启龙	谭震林	樊德玲	潘广生	薛清泉	薛喜梅(女)

秘 书 长  
吴 德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选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现公告如下：

委员长

朱德

副委员长

董必武 宋庆龄(女) 康生 刘伯承 吴德 韦国清 赛福鼎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畅(女)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女) 姚连蔚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千比 马成杰 马纯古 马学礼 马恒昌 王世泰 王世惠  
王观澜 王克强 王秀珍(女) 王作山 王冶秋 王茂全 王淦昌  
王景升 王道义 王耀花(女) 邓初民 邓颖超(女) 区棠亮(女) 贝时璋  
牛发和 毛迪秋 巴桑(女) 甘祖昌 龙梅(女) 史良(女) 白寿彝  
白迪·海山 朴春子(女) 吕玉兰(女) 吕正操 吕美英(女) 刘大年  
刘文辉 刘斐 江礼银 朱克家 朱良才 朱蕴山 伍修权  
许存贵 华罗庚 庄希泉 孙玉国 严济慈 克尤木·买提尼牙孜  
杨东莼 杨坡兰(女) 杨佩莲(女) 杨荣国 肖劲光 吴从树 吴玉英(女)

吴先锋	吴有训	吴冷西	吴承清	吴德峰	吴耀宗	沙千里
沙马力汗(女)		陈玉娘(女)	陈此生	陈阿大	陈奇涵	陈逸松
陈望道	陈淑清(女)	李凤兰(女)	李世荣	李庆霖	李延禄	李金荣
李顺达	李聚奎	张文裕	张世忠	张达志	张延成	张国清(女)
张洪池	张桂珍(女)	张铁生	张福财	武新宇	茅以升	林巧稚(女)
林丽韞(女)	岩 帅	罗叔章(女)	季 方	金秀清	金祖敏	周世钊
周叔弢	周锡林	周慧芬(女)	宝日勒岱(女)		赵忠尧	赵俊禛(女)
荣毅仁	胡子昂	胡 绳	胡愈之	侯 隽(女)	俞霭峰(女)	姚士昌
晋桂香(女)	夏菊花(女)	殷诚忠	郭宏杰	郭映福	唐克碧(女)	唐岐山
浩 亮	诸惠芬(女)	陶峙岳	姬鹏飞	黄作勤	曹轶欧(女)	崔海龙
康克清(女)	梁必业	梁吉泉	彭绍辉	董天祯	董加耕	董其武
粟 裕	傅玉芳(女)	傅秋涛	童第周	曾 生	曾 志(女)	谢静宜(女)
错 其(女)	解力夫	蔡树梅(女)	廖承志	樊德玲	薛清泉	薛喜梅(女)
魏秉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现公告如下：

总 理	周恩来	冶金工业部部长	陈绍昆
副 总 理	邓小平	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李水清
副 总 理	张春桥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刘西尧
副 总 理	李先念	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李际泰
副 总 理	陈锡联	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	王 净
副 总 理	纪登奎	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	李成芳
副 总 理	华国锋	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	边 疆
副 总 理	陈永贵	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	汪 洋
副 总 理	吴桂贤(女)	煤炭工业部部长	徐今强
副 总 理	王 震	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	康世恩
副 总 理	余秋里	水利电力部部长	钱正英(女)
副 总 理	谷 牧	轻工业部部长	钱之光
副 总 理	孙 健	铁 道 部 部 长	万 里
		交 通 部 部 长	叶 飞
外 交 部 部 长	乔冠华	邮 电 部 部 长	钟夫翔
国 防 部 部 长	叶剑英	财 政 部 部 长	张劲夫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余秋里	商 业 部 部 长	范子瑜
国家基本委员会主任	谷 牧	文 化 部 部 长	于会泳
公 安 部 部 长	华国锋	教 育 部 部 长	周荣鑫
对外贸易部部长	李 强	卫 生 部 部 长	刘湘屏(女)
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	方 毅	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庄则栋
农 林 部 部 长	沙 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 加强革命团结的保证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

方 海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号召，紧密团结起来为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感到格外亲切。

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依靠革命大团结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全党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就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在我们的国家里，存在着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完全可以做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因此，要加强革命的团结，首先就有一个划清敌我界限的问题。“谁是我

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我们不分清敌我，把敌人当成朋友，或者把朋友当成敌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有革命团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中的雷刚，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他那条扁担打了雇工田大江，那就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柯湘懂得雷刚这一扁担是打不得的，她用党的政策教育了雷刚，宣传了革命者在任何时候都要分清敌我，团结群众，打击敌人的真理。这就正确地地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了革命群众，从而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这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加强革命的团结，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一个如何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决定了这个阶级能够团结一致，结成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斗整体，这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基本方面。但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时候，这种斗争也必然会反映到工人队伍中来。工人队伍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斗争。农民阶级内部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广大的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他们是愿意团结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周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有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工农之间、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由于还存在着工农之间的差别，存在着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但由于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当这种矛盾激化了的时候，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也有可能向对抗性矛盾转化。在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般来说，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都要受到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无产阶级要领导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被推翻的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则妄图把人们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解放二十多

年来，国内的一切重大斗争，始终是围绕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的。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加强革命团结的基础。我们只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才能使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得到正确处理，才能使广大革命群众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

对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绝不可以采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更不可以不加分析地无限上纲。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历来认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高度发扬民主，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就是采取整风和批评教育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党一贯采取这种方法处理党群关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的关系。毛主席在总结我党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的经验时，把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团结。一九四二年整风后，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全国战场，全党一个劲，争取了全国胜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民主传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是在斗争中群众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我们党不仅运用这种形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解决人民内部是非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也运用这种形式解决大是大非问题。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我们党运用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不仅揭露和解决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促进了革命的团结，而且还运用这种形式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通过充分发扬民主，揪出了刘少奇、林彪这种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并且通过对他们深入持久的批判去教育和团结广大群众，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必须指出，我们发扬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决不容许阶级敌人鱼目混珠，趁火打劫；也不允许将它用作个人泄私愤、谋私利的工具。民主和集中是对立

的统一。只有全面地正确地理解两者的关系，才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毛主席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阶级敌人往往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我们对此必须提高警惕；同时必须过细地做好工作，适当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适当还是不当，最根本的就是要看我们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矛盾，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办事。只有通过矛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矛盾，解决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党是在分析和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例如对于敌我矛盾，就要采取专政的办法来处理。但是，就是在解决敌我矛盾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分析，也要区别对待，执行毛主席历来教导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对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处理。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正确处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了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了大多数，孤立了敌人，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现在，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我们仍然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推动革命大好形势的不断向前发展。

区分两类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做好了这一点，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单位。革命在发展，斗争在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需要我们加强革命的团结，而团结又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教导，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紧密地团结起来，积极完成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的更大的胜利。

# 《国家与革命》和叛徒布哈林

上海吴淞化工厂工人 余惕君

《国家与革命》集中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髓。认真学习这部光辉著作，对于我们今天领会四届人大文件精神，认真执行新宪法，勇敢捍卫新宪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要末不要任何国家，要末维护资产阶级国家，这是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时候修正主义者的两种谬论。前一种以隐藏在俄国党内的“理论家”布哈林为代表，后一种以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为代表。一九一六年，当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将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实践的关键时刻，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突出起来了。当时，布哈林首先跳出来叫嚷，说什么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包括工人阶级的国家，明目张胆地反对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一读到布哈林的文章，就尖锐地指出，布哈林“爬上了报刊”，“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主义者，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他们”。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布哈林和考茨基是一丘之貉，目的都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表示，要专门写一篇论文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国家与革命》就是这样地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诞生的。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面临着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鼓吹无产阶级不要任何专政、不要任何国家，那就只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反过来打败无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在一九一八年《国家与革命》出版的同年，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

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是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又有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在这种条件下,客观上长期存在着资产阶级,而且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是事实。一切修正主义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总是首先否定这个事实。布哈林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祖师爷。一九一六年他受到列宁批判以后,到一九一八年《国家与革命》出版的时候,就摇身一变,写文章称赞起列宁的这部著作来了。他真的回心转意了吗?不。列宁一眼就识破了他,严正指出:布哈林的“评论的性质暴露了一个很可悲和很值得注意的事实:布哈林观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时,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列宁并且列举了苏联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揭露了布哈林对这些任务“保持沉默”的阴谋。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这就是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再产生的条件。如果无产阶级不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而是半途而废,那末,这些资本主义痕迹就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列宁为了进一步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特别在一九一八年再版《国家与革命》的时候,总结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一年多的经验,增写了第二章的第三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列宁在这一节中,严厉批判了那种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并进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并且说:“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可是,在列宁说这些话不久,布哈林就在一九二〇年抛出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大肆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消亡”。列宁愤怒地指出,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刚刚建立的时候,就大谈它的“消亡”,这等于是“混淆人的生的‘过程’和死的‘过程’”,是“学究”的“蠢话”。布哈林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消亡”,实际上是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就根绝了资本主义的土壤?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布哈林鼓吹,只要建

立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政治经济学中一切基本‘问题’就都消失了”。列宁的回答则截然相反，指出：“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在消费品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的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货币和交换，就需要无产阶级多年的稳固统治，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战略上总是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进攻，而不是消极的防御。列宁说得很明白：“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在剥夺了城市资产阶级后，放在眼前的就有一个要不要继续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进攻的问题。列宁号召“要无情地向这些富农开火！消灭他们！”斯大林执行了列宁的路线，在农村发动了消灭富农的集体化运动。这时，布哈林又跳出来为富农辩护，鼓吹富农甚至资本家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布哈林提出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捡起这个武器，刘少奇、林彪也拾起这个武器，他们都用这些破烂货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学习《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回顾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段历史，增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要牢记历史经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大胜利！

# 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

——学习《国家与革命》的一点体会

辛 彬

《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了系统的精辟的论述。最近，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庄严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我们必须刻苦攻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前夕写的。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所阐明的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吸取了马、恩逝世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流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教训，总结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运动创造的新经验，强调在过渡时期必须有新型专政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高瞻远瞩地指出：“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列宁的这一段论述，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到对过渡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上，进一步阐明了整个过渡时期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地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列宁强调了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苏联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其中包括镇压白匪叛乱的国内革命战争和粉碎外来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那样大规模

的流血的阶级斗争,也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内尖锐复杂的斗争。列宁及时总结了十月革命及其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把它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过渡时期的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大丰富了《国家与革命》中关于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作为一个阶级还继续存在着,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还占有很大的优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地,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会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投入新的战斗,以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列宁深刻地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总之,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非但没有结束,而且变得更加尖锐、更加深刻了。这种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出发,列宁反复强调,在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明确地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认为,为了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为了粉碎他们的复辟企图和复辟行动,最后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决不能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在这里,列宁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剧烈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决定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

列宁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将贯穿于整个过渡时期,这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斗争过程。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同任何外国人勾结,背叛人民,出卖祖国”。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总是竭力用各种方法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敌人。叛徒、卖国贼林彪叛党、叛国,妄图投靠社会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充分证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串通一气,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其根本目的。

列宁还指出,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可以是反革命分子的武装暴动,也可以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

起来的”，“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习惯和私有制残余的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决定了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还没有完全铲除。同时，由于分配和货币交换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中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如果不正确处理，加以限制和调节，也会助长滋生资本主义势力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改造经济基础，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同时，教育改造小生产者，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除了仍然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外，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也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则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相矛盾的。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运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可靠保证，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生命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就是在这条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同时又用实践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和伟大威力。

我们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续和发展。“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制定的基本路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愿望。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还是改变这条基本路线。党的九大、十大都再次肯定了这条基本路线。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就是以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的。这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让我们热烈响应四届人大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抓好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

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党总支委员会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我们车间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广大群众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从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到批判历次机会主义头子的尊孔谬论;从批注《论语》、《三字经》,到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从批判儒家的书,到评注法家著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接连打了好几仗,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车间工人理论队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茁壮成长。这支工人理论队伍在一九七二年开始建立时,只有六个人,现在已经逐步发展到一百零五人。他们分布在车间的各个工段和班组,同班组群众一起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并且辅导工人读原著、看古文。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首先起来向儒家的经典《论语》开展批判,提出了“坚决把黑《论语》踩在脚下”的战斗口号。在车间选批了《论语》、《三字经》后,又陆续编写了《党内历次机会主义头子尊孔言论批判集》、《儒法斗争简史》、《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故事集》、《韩非子新注》等材料,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他们在学习四届人大文件的过程中,又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一步加深对新宪法的基本意义的认识。他们拿起钢钎能炼钢,拿起笔杆能战斗。工人群众看到这支新生力量在斗争中迅速成长,都很高兴,夸奖他们是:“批林批孔的先锋,班组学习的骨干,夺钢战斗的闯将。”

一支工人理论队伍建立起来了,怎样才能使它健康地成长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无论抓什么事物,都要注意抓方向。“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这就要求我们党组织在抓理论队伍工作中,首先要抓政治方向,教育他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学习,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

我们车间的理论队伍,百分之八十是青年工人,其中不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进厂的青年学生。他们有朝气,有闯劲,求知欲很强。但是这些青

年人进厂的时间毕竟还不长，还有一个继续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即使是老工人，也还有一个继续提高政治觉悟的问题。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工人理论队伍在成长中，必然会遇到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意识的侵蚀。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因此，我们经常同理论队伍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等教导，鼓励他们确立为革命而学理论的思想，克服那种“只想见报出成果，不想扎根到班组”、“只求名目新，不求学批深”的不良倾向，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能够经常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在揭发总支工作缺点的时候，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发展的新党员都说成是“听话”的“小绵羊”、“老绵羊”。车间理论学习小组的同志提出必须坚持分析的态度，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他们发表小评论指出：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文化大革命中发展的新党员绝大多数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表现得比较好的，笼统地把新党员都说成是“绵羊”，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团结。至于“听话”，更要作阶级分析，看是听那个阶级的话，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我们车间的工人群众经常对理论队伍提出，要他们密切联系群众，扎根班组，永远同工人群众战斗在一起。工人群众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工人理论队伍是主力军的尖刀班。尖刀班脱离了大部队，就会丧失战斗力，就不可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充分发挥先锋的作用。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工人理论队伍肩上挑的担子越来越重，有的同志出现了关门读书或长期脱离生产写文章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坚持把工人理论队伍的学习、批判同广大群众的学习、批判结合起来，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一方面根据实际需要，为理论队伍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每周安排一天集体学习时间，相互交流学习体会。除此之外，坚持要他们在班组同群众一起学习、批判。理论队伍应当主要根据班组群众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工作。比如，原材料工段就在最近几个月间一直抓住《三字经》反复、深入地批判，先是抓住一些重要论点，联系劳动群众在旧社会的苦难史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以后又结合儒法斗争历史批，最近又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基本观点来批，一次比一次深刻。他们所以能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工段的理论学习小组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立足于班组，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理论队伍的同志，既要坚持生产劳动，又要在业余时间从事许多活动，确实是比较辛苦的。但正因为这样做了，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许多工人主

动帮他们搜集资料，支持他们的工作，老工人还经常向他们讲家史，讲阶级斗争经历，使他们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得更好，从而使整个车间的学习和批判搞得生气勃勃。

工人理论队伍是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支军队，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这支军队唯一的武器。我们要培养一支能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的工人理论队伍，最根本的途径是要引导他们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分析历史和现状。我们车间理论学习小组的一些同志，开始研究和讲解儒家斗争史的时候，不善于分析，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在评论法家进步作用的时候，往往偏离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当强调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的时候，又容易抹煞了法家的进步作用。我们工人理论队伍的同志有一股热情，决心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但是，许多同志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多，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时候，批判、分析的能力还不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大家说：“炼钢没有火镜，分不清钢与渣；理论战士不学马克思主义，辨不出真和假。”批林批孔越是深入，就越需要学习，非下苦功学不可。因此，我们自始至终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组织理论队伍认真看书学习和批判上。在选批《论语》时，理论学习小组的同志认真学习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列著作中有关奴隶社会的论述，用来分析孔老二所处的春秋末期的阶级斗争状况。同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论述，作为批注《论语》的思想武器。在这过程中，大家体会到学与不学大不一样，学得深与学得不深大不一样，理论队伍所经受的锻炼也大不一样。只有认真学，才能深入批。现在，理论学习小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更高了，一般都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十多本马列著作，从而也带动了整个车间群众学习积极性的进一步高涨。

加强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是一件带有根本性的大事。毛主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要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没有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是不行的。要使工人理论队伍不断巩固和提高，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一定要继续把批林批孔搞好，使工人理论队伍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健康地成长，保证我们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上层建筑的一切阵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 评淮西之捷

——读《旧唐书·李愬传》

罗 思 鼎

公元八一七年，唐朝名将李愬率兵奇袭蔡州城，活捉了淮西藩镇割据势力的头子吴元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淮西之役。战斗结束不久，法家诗人刘禹锡以气势雄浑的诗篇，热情地歌颂了这一胜利：

蔡州城中众心死，妖星夜落照壕水。

汉家飞将下天来，马箠一挥门洞开。

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sup>①</sup>

李愬，字元直，洮州临潭人，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军事将领。唐朝自中叶以来，统一与分裂、革新与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天下尽分裂于方镇”<sup>②</sup>，各个藩镇的割据是当时政治局面不安定的根源。淮西（今河南东南一带）逼近京都长安，军阀吴少阳、吴元济父子在当地经营多年，其势嚣张，“强悍而不可遏”<sup>③</sup>，构成了对中央政府的严重威胁。“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sup>④</sup>李愬一举荡平淮西，为反对藩镇割据和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一）

淮西之捷，从表面上看是一旦一夕之功。其实，这一胜利来之不易。唐朝讨伐淮西割据势力的战斗，早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八一四年）十月就已打响。当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领军务，意图反叛。

中央政权诏诸道兵进讨，但战事连年无功。统帅象走马灯一样的调换，一个接一个都吃了败仗。直到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李愬担任了征讨淮西的前线指挥，才逐步扭转了不利形势。

为什么淮西战役前期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那些统帅们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不对头。拿讨淮军的第一任统帅严绶来说，此人是永贞革新的反对派，分裂割据势力在中央的代表。他拥有从八州征调来的大军，用来对付淮西三州之地，结果竟是“闭壁经年，无尺寸功”<sup>⑥</sup>。严绶下台后，继任者韩弘是个“以兵力自负”<sup>⑦</sup>、怀有“异志”<sup>⑧</sup>的军阀，根本“不愿淮西速平”，而是企图“倚贼自重”<sup>⑨</sup>，把讨伐淮西作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手段。同时，讨伐淮西的大将高霞寓和袁滋，也都是一些怯懦无能之辈。他们身为将帅，却一见形势不妙，就拔腿溜跑。由于将帅不得其人，官军内部“兵将相失”<sup>⑩</sup>，很不团结，斗志松懈，军心动摇。在这种分裂主义路线和失败主义情绪的影响下，战事的失利是必然的结果。

当李愬来到淮西战场的时候，面临着的就是这种“兵士摧败之余，气势伤沮”<sup>⑪</sup>的局面。要赢得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改变军纪松弛的状况；但由于前任将帅们所造成的恶果，官兵关系十分紧张，操之过急反而可能发生意外。因此，李愬并没有忙着去“肃军阵”、“齐部伍”，而是致力于肃清前任将帅所遗留下来的错误影响。他经常巡视兵营，深入部伍，在军队内部实行“推诚待士”的措施，反对以势压人。这样做的结果，团结了队伍，安定了军心，淮西前线诸军“军气复振，人有欲战之志”<sup>⑫</sup>。同时，李愬征集当地民众组成新军，并从河中、鄜坊地区招募了骑兵二千人。这支新军军纪严明，作战勇敢，在淮西前线诸军中起着骨干的作用。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终于改变了淮西诸军的“卑弱之势”，使战局从失败向胜利转化。

当时，以吴元济为头子的淮西割据势力，由于推行了一条分裂倒退的路线，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内部虚弱，不堪一击。他们到处屠城焚县，横征暴敛，“随日赋敛于人”<sup>⑬</sup>，十分不得人心。淮西地区群众奋起反抗吴元济集团的侵掠活动，“自备衣粮，保护乡里”<sup>⑭</sup>，充分反映了当时人民厌恶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愿望。至于吴元济集团的内部，更是矛盾重重，充满着争吵和内讧，当时人就曾经用“势实窘蹙”<sup>⑮</sup>四个字来形容吴氏反动集团分崩离析的困境。

但是，要加速敌人营垒的瓦解和崩溃，还必须依靠政策的正确、灵活和坚决。李愬十分注意从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开缺口。吴氏割据集团中的一般成员，特别是那些胁从分子，和反动头子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矛盾，成了李愬最先争取

的对象。元和十二年二月，唐军和吴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抓到了一个名叫丁士良的俘虏。此人原是唐军将领，在吴氏军阀攻占安州时被俘，是吴军中的一般将领。李愬亲自“召入与语”，对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并任命他为“捉生将”。

李愬不仅重视对吴氏分裂集团中一般将领的争取，而且对这个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吴秀琳是淮西藩镇中据守文成栅的重要将领，号称吴元济的“左臂”<sup>⑤</sup>，在唐军智取文成栅的战斗中被迫投降。李愬为了促使吴氏割据集团的分化瓦解，对于这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骨干分子，进行了细致的争取工作，“亲释其缚”，还找他谈话，使吴秀琳“感恩”不已，“期于效报”。唐军在另一次战斗中，巧擒了淮西藩镇中另一个重要将领、镇守兴桥栅的“骑将”李祐。李愬对他同样“解缚而客礼之”，并常常找他促膝长谈，甚至“与之同宿”<sup>⑥</sup>，了解了淮西藩镇的大量内部情况。

至于对吴元济集团中的顽固分子，李愬在加强军队进攻的基础上，尽力迫使他们从反动立场上转变过来。董重质的投降唐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此人是吴元济的谋主，属于吴氏割据集团中的死党之列。但是，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当这个顽固分子面临全军覆灭的时候，李愬利用蔡州城旦夕可下的形势，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他派人走访和安抚董的家属，又派人带亲笔信去见董重质，反复晓以利害。大军压境加上争取工作，董重质别无他路可走，只得“白衣泥首”，请罪投降。争取了一个，带动了一批。李愬由于根据不同情况，贯彻执行了区别对待的方针，促使吴氏割据集团迅速分化瓦解，“其下数叛，兵势日蹙”，“贼中降者相继于道”<sup>⑦</sup>。这样，反动头子吴元济被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了。

李愬所以能够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原来站在分裂路线上的人并使他们转变过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注意不纠缠于历史的旧帐，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矛盾，鼓励俘虏们反戈一击，立功赎罪。降将李祐是吴氏集团中的骨干分子，犯有“侮易官军”、“多杀官军”<sup>⑧</sup>的严重罪行。他被捕后，官兵们“皆请杀之”，群情激愤，呼声很高。但李愬从平定淮西的全局出发，在军队内部进行说服和劝止，引导部下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当时不断有人给李愬写信，说李祐是敌人派来的奸细，还说此事已从敌人的谍报人员的口里得到证实。李愬面对种种争闹不休的意见，一方面，严肃地对李祐说明他之所以为众人责难、不为所容的道理，使他对自已的罪行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他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将李祐带上刑具，解送京师，同时向朝廷送上了奏表，陈述争取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必杀祐，则无以成功！”当然，

李愬团结丁士良、吴秀琳和李祐等人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要求他们与以吴元济为头子的淮西藩镇势力划清界限，为国家的统一事业作出贡献。而丁、吴、李等人被李愬争取过来以后，也确实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同吴元济为首的分裂路线的决裂。例如：智取文成栅，就是根据丁士良的献策而成功的；攻占兴桥栅，则是由于吴秀琳提供内情的结果。至于李祐，由于他是吴元济割据集团的骨干分子，对淮西藩镇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在归顺后向李愬指出淮西精兵集中在洄曲，提出了乘虚直捣蔡州的建议。他在雪夜奇袭蔡州城的战斗中，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城楼，打开城门，迎接大军，立下了大功。“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sup>⑩</sup>奇袭蔡州成功了，吴元济活捉了。对于这类反动头子的处理，当然只有“槛送京师”，依法严办，别无其他出路。

## (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李愬能在淮西战场上导演了一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归根到底，是受法家政治路线支配并为法家政治路线服务的。

淮西之捷，这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法家路线的胜利。唐代以唐玄宗的尊孔崇儒为标志，开始了由盛转衰的过渡，在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当时，地主阶级内部围绕着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论战。革新派坚持法家路线，维护国家统一；保守派坚持儒家路线，鼓吹割据分裂。公元八〇五年，即唐顺宗永贞元年，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法家代表人物发动了一场在历史上被称为永贞革新的政治改革运动，主张“内抑宦官，外制方镇”<sup>⑪</sup>，以加强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后来，永贞革新在宦官集团和藩镇集团的联合反对下遭到了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流放到边远州县，但斗争却依然在继续进行着。唐宪宗元和年间，在要不要平定淮西藩镇的问题上，重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宰相李逢吉和王涯（此人曾参与对永贞革新的镇压）站在儒家路线的保守立场上，竭力“不欲讨蔡”<sup>⑫</sup>，多次“请罢诸道兵”<sup>⑬</sup>。相反，裴度作为永贞革新的同情者，“以平贼为己任”<sup>⑭</sup>，成为主战派的政治首领。裴度深刻分析了淮西割据势力的危害性，强调“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指出“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sup>⑮</sup>，会动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根基。当时，柳宗元也积极参加了这场政治论战。他早在永州时就曾经撰写了《封建论》这篇著名政治论文，从理论上对秦始皇以来关于封建与郡县、统一与分裂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迎头痛击了这股鼓吹复古倒退、分裂割据的反动思

潮。这场论战的结果，唐宪宗罢免了一批阻挠平定淮西的官僚，任命主战派首领裴度为宰相，坚持统一的法家路线在朝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愬才被得到重用并取得了淮西战役的胜利。李愬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能正确地理解法家政治路线领导的重要性。就拿他与裴度的相处来说，裴度的本官不过是四品门下侍郎，由于极力主战，才被提拔成宰相兼淮西诸军的最高统帅。李愬出身于将门世家，其父李晟曾被封为西平郡王，官至太尉、中书令，李愬本人是三品的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曾在东宫任职，与唐皇室的关系很深。无论从门阀、资历和官衔来看，李愬都比裴度要高得多。但李愬处处顾全大局，对裴度十分尊重。他在攻下蔡州城后，并没有因此把尾巴翘到了天上，而是背着箭袋，恭恭敬敬地站在路旁迎接裴度的到临。裴度不愿接受如此隆重的接待，但李愬诚恳地对裴度说明这不是为了对他个人的礼遇，而是为了进一步树立中央政权威信的需要，使裴度十分感动。

淮西之捷是法家路线在军事上对儒家路线的胜利，儒家之徒对它恨之切骨。淮西战场上的烽烟还未散尽，朝廷上环绕着对淮西战役的不同评价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场论战的序幕是由韩愈的《平淮西碑》揭开的。韩愈在淮西之役中曾随军当行军司马，是淮西战场的耳闻目睹者。他在《平淮西碑》的碑文中，对李愬的功绩闭口不谈，只在序文中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却把功劳归之于分裂主义者韩弘，把这个败将美化成是淮西战场上的英雄统帅。韩弘看了碑文喜出望外，赶忙写信向韩愈道谢，还特地送了五百匹绢的厚礼。韩愈这个道学家尽管贪财如命，但也知道这笔财礼烫手，故作正经地向唐宪宗上奏表，直到朝廷下旨表示同意后才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韩愈这种篡改历史的恶劣行径，引起淮西将士们的愤慨，发生了李愬部将石孝忠冒死推倒韩碑的事件，乱哄哄地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唐宪宗经过调查后，终于下令砸碑，磨灭字迹，由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平淮西碑》。

柳宗元、刘禹锡等法家代表人物与韩愈的儒家立场截然不同。他们对李愬的淮西之捷采取了热情歌颂的态度，而对韩愈撰写的碑文公开表示不满。柳宗元不仅写了《平淮夷雅》的长诗来歌颂裴度与李愬，并且亲自写贺信给李愬，信中表明了自己为法家路线而奋斗终生的决心，说：“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辅万分之一，虽死不憾。”<sup>②</sup>从这里可以看出，柳宗元把李愬引为知己，看作是志同道合的法家人物。法家代表人物刘禹锡也写了《平蔡州》诗三首及《贺收蔡州》文，生动地描绘了蔡州收复后“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sup>③</sup>的历史画面。时势造英雄，斗争出人才。唐代中期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造就了一大批法家代表人物。王叔

文、裴度、柳宗元、刘禹锡、李愬等人，分别在政治、思想、文学、军事等各个领域内，为捍卫和执行法家路线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往往在一个时期内成批地出现，而不是孤零零地单独存在着的。他们代表着进步阶级或进步政治集团的利益，组成一个法家阵营，主张统一、革新，反对分裂、倒退，为反儒尊法而共同战斗。当然，他们作为历史上剥削阶级的代表，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深刻烙印，这是我们不可苛求于前人的。

关于《平淮西碑》的这场争论，一直继续了很长时期。宋代的法家杰出代表王安石批评韩愈的《平淮西碑》是“笔墨虽巧终类俳”<sup>⑳</sup>，明代的李贽也站在法家的立场上赞扬李愬有“大见识力量”<sup>㉑</sup>。相反地，宋代有首相传为苏轼这个儒家之徒所写的诗，竭力为韩愈翻案说：“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指韩愈）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sup>㉒</sup>朱熹就对这首诗十分推崇，倾倒备至。还有个名叫陈瓘的儒家之徒，竟把碑上的段文磨去，重新刻上韩文。儒法两家，壁垒如此分明。这场争论的延续将近一千年，充分证明了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长期、曲折和反复。今天在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个特点。

注：

①④⑩⑳ 《平蔡州》，《刘梦得文集》卷五

②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〇《唐节度使之祸》

③ 《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少诚附吴元济传》

⑤⑥⑧⑨⑬㉑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⑦ 《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

⑩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愬传》，下引同书，不再注明出处

⑪⑫⑬⑭⑮⑯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⑰ 《新唐书》卷二一四《吴少阳传》

⑱ 《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

㉒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

㉓ 《新唐书》卷一七四《李逢吉传》

㉔ 《柳河东集》卷三六《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

㉕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诗用其韵和酬》

㉖ 李贽：《藏书》卷五一《武臣传·大将·李愬》

㉗ 见朱熹：《韩文考异》

# 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红 宣

伟大的中华民族自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形成过程，其间充满着融合与分离、统一与割据、和睦与纷争等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运动。在二千多年的全过程中，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二，而割据、分裂的时间只占三分之一；而且，统一与团结的时间愈到后来就愈长，分裂割据的时间则愈来愈短。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唐初的历史，可以为证。

## (一)

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贞观时期，我国各民族在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下，出现了空前团结的盛况。当时，在首都长安，居住着许多穿着鲜艳民族服装，操着各种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他们之中有的是各族派遣来的政治使节，有的是从各少数民族地区来沟通文化、交流经济的代表，有的是到京都国子监读书的少数民族子弟，还有的是在唐朝廷里任职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这些居住在长安的少数民族，多达一万几千余家。每逢吉庆大典，各族首领和使节纷纷来朝，“道路不绝”，“元正朝贺，常数百人”。公元六三三年（贞观七年），李世民在皇宫里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庆祝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宴会上，李世民同各族首领欢聚一堂，突厥族的颉利可汗兴致勃勃地跳起了富有民族色彩的舞蹈，南部少数民族的首领冯智戴则满怀深情地赋诗咏颂，出现了所谓汉、胡、越一家的团结景象。公元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李世民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和发展各族间的团结友好关系，将文成公主远嫁给吐蕃赞普（王）松赞干布，开创了汉、藏两族团结合作友好往来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唐王朝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非常频繁。西域的棉花、葡萄酒、工艺品、舞蹈、音乐等，先后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书籍、医药等等，也流传到西域、吐蕃等地。长安与各民族地区，驿传相连，州县相望，交通畅行无阻，商旅往来便利。单以北方为例，从漠南到中原地区，就设有六十八所驿站，站里备有马匹、饮食，以接待各民族的往来旅客。李世民还派遣了一批工匠、技师、学者，到少数民族地区帮助他们进行经济

文化建设。各民族的团结和友好，带来了唐王朝的边疆安定。唐朝的疆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我国中唐时期有名的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中亚细亚突厥族聚居的碎叶城。这种“四海宁一”的局面，同西晋南北朝以来国家分裂割据、民族长期混战、城市沦为丘墟、土地大量荒芜的景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唐初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各民族联合的发展，不仅保证和奠定了唐三百年封建王朝的基础，而且为我们祖国今后一千多年中辽阔疆域的巩固，中华民族各族之间的团结与融合，以及最终形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作出了伟大贡献。明末坚持法家路线的卓越政治家张居正，在嘉靖年代国家衰弱、外族入侵之时，曾感慨万分地说：“那忍见毡裘”，“侧想歌皇唐”，表达了后世一切进步思想家对唐代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力强盛的歌颂与怀念。

## (二)

李世民是封建中世纪地主阶级中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是封建社会中期继承秦皇、汉武帝以来的法家路线的一个代表者。他反对分裂割据，主张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张民族团结。自从他在隋末起兵之后，就为重建封建统一国家而斗争，先后消灭了各地的分裂割据势力和击退了突厥奴隶主贵族的侵略活动。他继位以后，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从历代的兴衰存亡中和成败得失中加以比较鉴别，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他十分推崇秦始皇、汉武帝、魏武帝（曹操）等人推行的加强多民族国家统一事业的法家路线。李世民曾在《春日望海》诗中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这里说的“图王”，就是指要继承发扬秦皇、汉武帝加强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的伟大事业。有一次，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原因。他问群臣：古来的帝王虽然能平定境内，但是却不能安定少数民族。我的才能不及他们，而这方面却比他们成功，这是什么道理？群臣众说纷纭，但都讲不清楚。李世民说，我成功的原因有五条。其中一条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就不持这种偏见，以同等的态度看待各个民族。这段话说明了他的民族政策同儒家思想的尖锐对立。历史上那些尊孔崇儒的封建统治者，诬蔑少数民族“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他们挑动各族之间的相互歧视和仇杀，使民族之间“怨毒入于骨髓”，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了西晋南北朝以来三百多年的国家分裂、民族混战局面。李世民总结了这种历史教训，提出反对“贱夷狄”的思想，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个进步。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他对于凡是拥护封建中央政权，愿意同唐王朝友好相处或主动来归附的各少数民族，都一律表示欢迎，对他们表示一视同仁地以礼相待。对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则由中央政府给他们安排官职，或让他们统帅旧部，或留在京城在中央政府担任工作。当时在唐京都的少数民族官员“布

列朝廷”，仅五品官以上就有百来人，“殆与朝士相半”。其中较著名的如吐谷浑王子慕容顺被封为西平郡王，阿史那思摩被任命为右武侯大将军、怀化郡王，契苾部首领何力被任命为左领军将军。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对当时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都先后作出过大小不同的贡献。就是对过去那些站在敌对立場上的人，只要他们能够真心改变态度，李世民也同样采取了团结的方针。他在俘获突厥的颉利可汗后，没有“献俘太庙”，杀了庆功，而是安排其担任虢州刺史，颉利不愿往，又改任为右卫大将军。这种从统一、团结大前提出发而优待俘虏的政策，证明李世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

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只有坚持国家的统一，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团结；而各民族间的团结发展了，国家的统一才更加巩固。李世民十分欣赏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见解，注意把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两个侧面有机地联系起来。李世民在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设立受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州、县、都督、都护府等机构。都督府以下官吏，大部分由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都护府的都护则由中央委派。例如突厥归附之后，就在大漠南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和单于都护府，在新疆的天山南北路，设立安西都护府。各都督府均受都护府的统辖和领导。这种做法除了隋朝曾有过类似的尝试外，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它不仅加强了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区的联系，而且有利于消除各族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使得各民族能互相接近。

李世民在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统一领导的同时，比较注意各族之间长期形成的不同特点和风俗习惯。他允许各少数民族实行某种意义上的“自治”，给予这些民族以相对的独立权。这种政策，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要求的。

### (三)

唐太宗的这种较为进步的民族政策，固然是由他的法家路线决定的，但更深刻的原因却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之中。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开始了各民族的融合。中华各民族在这块东方古国的土地上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虽然各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冲突和斗争，但从历史主流看，各族之间的接触和联系，日益增加和密切。要求安定，要求友好交往，始终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而民族仇视、民族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剥削阶级中的那种复辟倒退势力，即少数民族中的奴隶主和汉族地主阶级中搞分裂、割据的反动集团。他们为了本阶级或本集团的狭隘私利，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挑动民族矛盾，以至发动侵略战争。因此，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

隋末唐初，我国北方的突厥奴隶主始毕可汗和颉利可汗乘隋末农民起义军尚未形成统一的全国力量的时机，公然挑起侵略战争。当时汉族的一些地主豪强如薛举、梁师都、

刘武周等人，纷纷与突厥可汗相勾结，借用外族武装力量，实现其分裂割据的罪恶目的。他们“抄掠州郡”、“虏掠人畜”、“暴虐滋甚”，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种违背汉族和突厥族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反动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两族人民的共同反对。由于突厥可汗“兵革岁动”、“政令烦苛”，引起突厥人民“不悦”，加上他们“征税无度”、“重敛诸部”，更引起回纥、薛延陀诸部以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不满和反抗。他们纷纷抛弃颉利可汗这一奴隶主军事集团，自愿归附唐王朝。当时“绝域君国，皆来朝贡”，“九夷重驿于道”，说明各少数民族是反对突厥侵略战争而要求各族的和平友好和团结合作的。就汉族广大人民来说，他们对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军阀混战、民族分裂的痛苦记忆犹新，更是迫切希望国家统一，各民族友好相处。公元六二九年（贞观三年），“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来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万口”。贞观五年，被突厥族俘虏的汉族人民回到中原故乡的又有八万多人。这在当时只有三百多万户人口的贞观初年，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史书上所谓“百姓乂安”、“四海皆仰皇风”这类话，撇开其对封建统治者的歌功颂德不论，实际上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民族纷争，要求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心理的一种曲折反映。

但是，人民群众的这种善良愿望，几百年来总是落空。原因在于东汉末年以来形成的世族大地主是一股庞大的社会势力，他们是分裂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挑动民族纠纷的罪魁祸首。他们把当时中国搅得乱七八糟，使百姓不得安宁。只有对这一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阶层作一次猛烈扫荡，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战争，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农民革命战争的力量，沉重地打击了世族豪强，使得这些分裂割据的潜在势力“多失衣冠之绪”，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这就为唐初的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创造了条件。同时，魏晋南北朝年间的民族大迁移，一方面固然制造着战乱的痛苦，另一方面却也加速了各族之间交流、同化的过程，使人们在民族问题上打开了新的眼界。就拿李世民自己来说，他的家族就出身于汉化的胡人。正是由于具备了以上种种条件，才出现了唐初民族团结的局面。

隋朝覆亡以后，地主阶级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幅“城邑萧条”的图画。在这种情况下，唐初的封建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并造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恢复和发展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增加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剥削收入。用李世民的话来说，就是“所以不戢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这就是李世民族政策的出发点。他实施一系列维护民族团结的政策，目的虽然是体现着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在巩固国家统一、发展民族团结这点上，与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有一致的地方，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李世民成功的重要条件。

#### （四）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李世民维护民族团结的政策所以能实现，是当时儒法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结果。

李世民虽然出身贵族，但“年十八，犹在民间”，对社会下层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执政后，大胆任用了一批出身庶族地主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坚持法家路线的代表人物。这一法家政治集团反对割据，拥护统一，主张抗击突厥侵略势力，实现民族团结。而站在这一路线对立面的，是李渊及建成、元吉等人。他们任用肖瑀、封德彝等一批出身世族地主执行儒家路线的大官僚，对突厥奴隶主军事侵略集团一味卑词厚礼，妥协退让。结果突厥奴隶主并没有被感化，反而变本加厉，肆意侵掠，一再挑动民族战争。当突厥侵略者骚扰到中原心腹地区时，李元吉就临阵脱逃，放弃太原；李渊、李建成不知听了那个昏虫的鬼话，居然准备焚毁长安，迁都出逃，想以妥协退让使“胡寇自息”。只是由于李世民力排众议，坚决阻止，才使这个荒唐的计划未得实行。公元六二六年，突厥颉利可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率兵直抵唐京城长安的渭水桥北。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肖瑀、封德彝等一般儒家之徒，吓得发抖，战战兢兢地提出对侵略者“请礼而遣之”。对此，李世民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对侵略者示之以弱，“闭门拒守”，讲什么“礼”、“义”，敌人“必谓我惧”，“必纵兵大掠”。他严厉驳斥了肖瑀等保守派的投降言论，亲自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有惧色，不久即引兵退走了。

这种斗争后来一直继续了很长时期。公元六三〇年（贞观四年），唐朝李靖等猛将挥师漠北，会战阴山，大破突厥军，俘虏了颉利可汗，归附的突厥部落有十万多人。那伙儒家之徒一会儿说在边远地区设置州县是“取无用之地”，“不如弃之”；一会儿说发兵戍边、实行屯田等措施是“糜费”，是“耗其根本，以厚其枝叶”。李世民决然反对了这种主张，对突厥广大人民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的政策，把他们安置在幽州（今北京）至灵州（今甘肃境内）一带居住。后来证明，这种做法对保护唐朝边域和各族人民的生息都起了积极作用。

民族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团结都有它的具体的历史内容。李世民是个地主阶级政治家，他不可能超越阶级的界限去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在民族问题上不可能不受狭隘的剥削阶级私利和偏见的支配。他所采取的民族团结政策，鲜明地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目的是为了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之间的团结，以进行权力财产的再分配。这就决定了这种团结必然是暂时的和不巩固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者是不可能真正实行民族平等的。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科学地解决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问题。只有彻底铲除剥削制度，才能消灭产生民族不平等的社会根源。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 “九州生气恃风雷”

——《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

陈旭麓

(一)

恩格斯说，但丁在欧洲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在中国历史上，龚自珍也恰是这样一个“最后”和“最初”转折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诗人。

龚自珍，字璩人，号定盦，又名巩祚。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一个读书做官的地主阶级家庭，是从科举考试中滚过来的，中了进士，多年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的小官，受清朝统治者的冷遇，死于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的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在他活着的五十年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他的绝大部分年岁虽然是在近代开始以前度过的，但他的愤激辛辣的诗文，不只是过去的挽歌，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指向将来。

龚自珍从早年到晚年，随着视野所及，探索所得，将他的精力和才华，锤炼为三百多篇散文和近八百首诗词。这些文章和诗词，过去印过许多不同的本子。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经过整理、校订、标点，印行了比较完善的《龚自珍全集》。为了适应儒法斗争研究的需要，上海人民出版社现在把它重印出来。

《全集》按文章体裁和各体诗编年，分为十一辑，涉及的范围虽较广泛，也颇庞杂，但有一个基本趋向，那就是有人在鸦片战争后评述的：“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开什么“风气”？即他围绕着当时的政治、社会发挥议论，反儒尊法，“慷慨论天下事”，尖锐地否定了乾隆、嘉庆以来极为流行的脱离政治的考据学和苍白无力的桐城派古文，以及满坑满谷追求格律、性灵、神韵的各派诗，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关心现实的政治、社会矛盾方面来。

龚自珍这种“开风气”的文章，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类：一、直接议论政治、社会矛盾的，如第一辑中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箴议》一系列文章，以及第五辑的表、启、笺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篇章，这些是《全集》中最有战斗意义的部分。二、以论学的形式论政，或者触及政治，如《壬癸之际胎观》一类文章，他自己所谓的“天地之学”，从着眼变革引发出了可贵的

朴素辩证法思想；如《古史钩沉论》《论史》等文，发挥了史学关系一代政治兴衰诸论点；如研究西北地理的文章，论证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开拓广大西北地区的历史关系。这些论著把学术和政治统一了起来，体现了他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思想。三、有关碑传和记事的文章，留下了若干耐人寻味的史实和掌故，是当时政坛的侧影，而《捕虻第一》《病梅馆记》等富于讽刺性的寓言式说叙文，则启导了后来的讽刺文学和杂文。

## (二)

揭露和批判，是龚自珍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他那个时代和社会赋予他的使命。十八世纪中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封建统治，已感到“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过了七八十年，这个封建王朝反映在龚自珍笔下，则完全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衰世”，“内囊”已将兜底翻了出来。他用“将萎之华，枯于稿木”，形象地概括了这个封建“衰世”的表征。

黑暗、腐朽的封建“衰世”，将龚自珍推上了批判之路。他力图冲破反动统治阶级越来越依靠得紧的弥漫当时的儒家思想，打开一条路。他否定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说“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认为儒家是春秋战国时“九流”中的一个不光彩的流派，那些峨冠博带的“魁儒”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他深有所感地指出：“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这是对历史的颠倒。他断然回答，是“先有下，而渐有上”，“帝若皇，其初尽农也”，是首先有了劳动人民而后产生上层统治机构的。不管龚自珍自己是否意识到，无疑，这是从总体上给儒家的反动政治、社会学说戳了一个窟窿。

由于儒家的颠倒历史，通过历代反动统治者之手，造成无数精神绳索，使人们动弹不得。龚自珍指出：“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例”就是那些陈陈相因的旧传统、旧礼制。正是这些千丝万缕的陈年旧“例”，迫人“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所以，这个社会已毫无生机，“不闻余言，但闻鼾声”。

但是，“后世儒益尊，儒者颜益厚”，他们厚着脸皮，自欺欺人，上上下下还在那里粉饰太平，把“衰世”装作“治世”，制造无数假象，“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以致“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索；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一议”。这还成一个什么世道，龚自珍进一步控诉说，当其时，“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刃、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这是对“名教”杀人的特写，将反动封建统治者和儒家的虚伪、阴险、奸猾嘴脸，刻画得维妙维肖，刻画出了他们的杀人不见血的特种刽子手本领。“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管龚自珍有没有这种认识，他对腐朽封建势力的揭露和鞭挞，是符合这种客观要求的，也是他那个时代进行政治、思想斗争首先必须拿起的武器。

龚自珍毅然同反动统治者唱反调，向儒家挑战，是他正视现实，由“所见所闻，胸弗谓

是”，大胆批判，从而走上了法家路线。走这条路当然不可能是平坦的。儒法斗争，长期以来就是两种政治势力、两条路线的斗争，并经常成为对人们的争夺，龚自珍正是从这种激烈的争夺中斗过来的。《释言》一诗中反映了这个情况：一个显赫的“上相”向他施加压力，禁止他议论时政，他以“守默守雌容努力，无劳上相损宵眠”的句子，拒绝了这种无理干预。有些好心肠的朋友怕他受到迫害，则要他删毁尖锐的《乙丙之际箴议》，他说“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就是明证。

对这种争夺，龚自珍还有过生动的纪述。他说那些“友朋之贤者”陈奂、江藩等经学家，劝他“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答以“方读百家”，“未暇也”。过了些时候，“有个内阁先正姚先生”也劝他“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答道：“又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所以，他“卒不能写定《易》《书》《诗》《春秋》”。这里的所谓“写定”，是指对儒家经籍的诠释发挥，龚自珍一再拒绝这样做，那是证明他下定决心不愿去做被孔孟之道牵着鼻子走的“书蠹”“魁儒”，而要放开眼界去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他经常以“后史氏”自命，表示与那些拘守经学传统、厚古薄今的“古史氏”不同。魏源说他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就是对他所称“后史氏”注重当代历史的说明。

龚自珍同经学家斗争，不守儒家绳墨，是很明显的。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说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人们一直沿用下来，一谈到龚自珍思想，就断定他的议论政治，主张变革，是导源于“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公羊学，把他看作一个经今文学家，这是很不确切的。龚自珍虽在二十八岁时向刘逢禄学公羊学，魏源也说他“于经通公羊春秋”，但是，仔细查一下龚自珍的论著，“讥切时政”最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箴议》诸文，都写于二十八岁之前，与公羊学毫无关系。在这之后写的有关政论文章，也是他前一时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决不能说全是公羊学引发的。而且龚自珍从事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子学、经学、史学、地理、文字学、金石、佛学以及诗词，都有论述，经学并不占重要地位，即使在一些论经的文字中，也是今古文经学并举。因此，龚自珍没有成为一个专讲什么“微言大义”的公羊学家，也没有成为经学家。梁启超硬要说他是有了公羊学才使他议论时政的，明明是混淆学术思想的“源”和“流”的关系，将学术思想的历史之“流”代替了主要来自社会实践和斗争之“源”，这是从儒家的反动历史观点出发，抹煞儒法斗争的实质，为他们崇奉董仲舒公羊学的尊孔路线虚张声势。数十年来，学术界上了他的大当。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龚自珍思想之所以具有战斗性，受到重视，就是在他那个时代的鞭策下，他敢于深刻揭露政治和社会的矛盾，主张打破现状，弃旧图新，决不是什么公羊学影响和推动了他。我们说龚自珍继承了法家路线，主要是就法家“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因时变革主张而言，那时龚自珍还找不到新的物质力量，只能从历史上去找法家这样的思想武器。“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汉武”，表示他早年就瞧不起儒家吹捧的“先王”，向往法家推重的“后王”，对开辟统一中国伟大事业的秦始皇和巩固、发展这一统一事业的汉武帝是比较好感的，希望有这样的人出来振衰起敝。这就证明龚自珍根据自己的时代要求，走上了反儒尊法的道路，他的反儒尊法思想，又具有他那个时代的特殊内容。

### (三)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法家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循着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龚自珍思想强烈地体现了这个要求,他十分赞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阐明的观点,说“汉既用秦之郡县,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国,与守令之郡县,相错处于禹之九州,是以大乱繁兴”。认为封建与郡县是“天不两立”的,“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历史上的旧制度的鄙弃,对新制度的欢迎,并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是“天必有所趋”的客观规律。

根据这种认识,龚自珍立足当世,联系历史,发出了“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的呼声,肯定了改革是必由之路。并向清朝统治者提出警告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认定“一祖之法”没有不产生流弊的,众人的议论有着很大的威力,在众人的议论下,还死守“一祖之法”不放,别人势必取而代之来改革。这样,不如自己及时主动地改革好。对颟顸、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仍寄以起死回生的希望。

改革是要前进的,为了消除对改革的疑惧和阻力,又要回头看,以历史上的改革为自己的先导。龚自珍说他的主张,“是仿古法而行之,正以救今日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而不更法?”他所说的“仿古法而行之”,就是继承法家路线,借历史的威力为自己的改革开拓道路,目的在于“救今日之病”。所以他热情地歌颂商鞅的“垦土令”。他在皇帝殿试策问时,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阐述自己的设想,说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恩格斯曾经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否定中世纪的黑暗统治,这个“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自然辩证法》,《科学历史摘要》)。可见“古为今用”是个存在于历史自身内部的客观法则。龚自珍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这个客观法则;所以“古时丹”在他身上又是历史惰性的表现。

龚自珍的“更法”主张,不只是着眼于以儒家为精神支柱的反动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的极端腐朽,并触到了他那个社会的基本矛盾。他写了著名的《平均篇》,揭出这种基本矛盾说,“浮(富)、不足(贫)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如果让“浮”与“不足”长期分化下去,则“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生民嚙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从历史上的治乱,看出了那时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造成的“大不相齐”现象,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严重程度。他的结论是:“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就是说治理国家者,现在没有比“平之”更为重要的了。他提得如此尖锐,落得却很迂缓。他在继《平均篇》之后写的《农宗》中,对处理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是想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调节土地的分配,以克服“大不相齐”的矛盾,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不可否认,在农民阶级自己也还不可

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平均”思想不能说完全没有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即使是局部的。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宣传法家路线、满怀改革热忱的龚自珍，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同反动封建统治者又是显然不同的。他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叛逆性，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接近。他自许为“高文”的《尊隐》，把“京师”和“山中”对立起来来说，是寓有深意的。“京师”象征着清王朝，“山中”则是指和“朝”相对的“野”，“京师”是政治指挥部，“野”是听命于“京师”的，但这种主从关系可以相互转化。他说：“京师之气泄，则府（作藏字解）于野矣”，“京师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一连几个对举，说明“朝”和“野”的消长变化，终至“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成群结队地起来，“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之为之波涛”。这里决不是龚自珍的凭空构思，而是他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南北各地会党活动频繁，白莲教、天理教大规模起义投射的影子。历史与现实的教训，这个影子在他脑子里不断晃动、放大。

“山中之民”所指对象，过去有过不同理解，事实上是包括隐于野而有反清思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来自广大农民的会党群众。龚自珍说过，“生于本朝，仕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就是对地主阶级知识阶层中存在的反清力量的曲折表达。这些人“一啸”，还有赖于会党群众的“百吟”，才能汇成为“大音声”。这就是他呼唤的“九州生气恃风雷”，希望借“风雷”的威力，去打破“万马齐喑”的死寂局面，以实现富有“生气”的改革。

要求改革，是推动社会前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表征。当人们发动改革运动时，民族矛盾逼了上来，主张改革的人，也往往是坚决主张抵抗、反对妥协投降的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不少就是由外迫强敌推动起来的，在近代中国更是如此。龚自珍的改革思想正是深深地扎根于国家民族土壤中的。他生长江南，不忘祖国边疆，用力研究西北地理，写下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西域置行省议》就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著名政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发挥历代法家的移民实边政策，把它同他的社会改革主张紧密联系起来，说“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并强调移殖的人，要“性情强武”，以适应西北环境，充实边防。我们知道，自《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相继签订，暂时遏止了沙俄的侵华野心，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落，沙俄对我国东北、西北边疆日益狡焉思启。因此，研究西北地理，不只是为了开发边疆，在当时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东南沿海出现的新形势，更使龚自珍觉察到时代风雨和外来侵略势力对中国开始呈现的压力。鸦片战争前，他已指出鸦片的源源输入，“丧金万万，食妖大行”，给中国带来了祸害，写了《东南罢番舶议》（此文已遗失）。并警惕到“隆匪高鼻”的西方资本主义强盗“环伺澳门，以窥禹（番禺即广东）服”，必须严加戒备。当他的老朋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恳切提供建议，热烈支持禁烟，打击来犯之敌。指出那些阻挠禁烟的妥协派，口口声声“曰惟宽大而已，曰惟无用兵而已”，无非是要中国放弃禁烟，放弃御侮。他坚决主张“刑乱邦用重典”，对“黠猾游说”、“貌为老成迂拙”的破坏者，“宜杀

一傲百”。毛主席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论持久战》）龚自珍在这里所表现的，是以鲜明的法家观点，有力地否定了儒家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当林则徐到达广州发动了反对侵略的禁烟斗争时，他又写诗怀念：“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葢（完成的意思）勋。”诗中所关心的是“侧立南天”、身负民族重任的林则徐，关心的是林则徐能不能打破阻力、完成艰巨的禁烟事业。

龚自珍在他生前，就是这样全神地注视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近代时正在发生的巨大事变，证明他的改革思想和爱国志愿，是带着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跨入中国近代历史的。

#### （四）

如前所述，龚自珍揭露黑暗、倡导改革的政治路线，是对封建末世反动统治的勇敢冲击。作为文学家、诗人的龚自珍，他的作品是这一政治路线的产物，是那个该诅咒的时代和社会的控诉书。他自己有个生动的比喻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哉！”是说那个千奇百怪、鬼域横行的“外境”，“如风吹水”般一阵阵袭来，“水”不能不承受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他的文章，就是他经过概括、加工，勾画黑暗势力各种鬼脸的文章。

诗，在他的作品中占很重要地位，在清代或近代诗坛上是有独特风格的。他的写作手法，是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同他的文章一样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矛盾，有强烈的现实感，而又浮想联翩，“遂挟奇心恣缥缈”，流露着丰富的浪漫情感。形式也多样化。其中的《己亥杂诗》一大组七言绝句，是他一八三九年从北京辞了官，往返南北的旅途上写的，把所见到的想到的和追忆的，驰骋想象，一一发之为诗，是他一生生活、思想、感情的记录，连缀起来，可以当作他的自传读，也可以引伸为反映社会矛盾的长篇小说读。因此，评述龚自珍其人及其思想，不可不读他的诗，不可不知他的诗。

龚自珍的诗文，“文词俶诡连犛”，隐晦曲折，骤读之下，难于索解，须透过文字上的烟幕，寻出“怨去吹箫，狂来舞剑”的思绪，才能认出本意来。这又是他在反动统治的政治压抑和儒家传统思想的重重围袭下，不得不采取的迂回战术。他说：“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滴言之，未言声又吞。”所以，“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不能把他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将“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欢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积思”、“寡欢”、“多愤”，恰是他被压抑的“难明言”、“声又吞”的感情的自白，也是他这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不敢也不可能真正同顽固反动势力决裂的反映。他呼唤“风雷”，“风雷”却不是他自己。

龚自珍思想的战斗性，是时代和社会的感召；它的局限，又是他所处时代和所属阶级的必然。在龚自珍活动的年代里，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外国资本主义也飘洋过海渐渐渗入中国，已经出现了“以外洋之物是尚”的情节。这种资本主义因素迟早是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里来的，首先总是要通过不当权的有改革要求的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脑反映出来。从龚自珍思想中是可以嗅到一点这种因素的气息了。他诅咒超经济剥削者是“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挟百执事而颠倒上下”的寄生阶级，只图“农民织女之所出，于是乎共之”，对这些人的打击，是想引导人们走向经营生产的道路。他在《农宗》设想的土地分配方案中，说“天谷没，地谷苗，始贵智贵力”，主张“以万夫耕者授万夫长，以千夫耕者授千夫长”，就是分田多少，也要以经营能力和劳动力为标准。在《论私》等文章中，向往近似资本主义的私富。但龚自珍毕竟只是一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他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拆地狱的台，拆反动封建统治的台，新的因素在他身上还是若隐若现的，因为那时并没有出现一个足以促使他转化的新的物质力量。他诗中反映的，“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凌气欲成云”，对自己追求的境界好象充满了热望和信心，然而逼上前去，仍是摸不着，捞不到，“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留下的是一片疑云和猜测。

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龚自珍不可能迈出更大的步子。他反儒尊法，却不敢触犯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他看到了“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却又承认“有亿万年不变之道”。他对腐朽的清王朝虽也表示绝望，“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莫虚陈”，公开提出“一姓不再产圣”。还对封建士大夫阶层进行分化说：“徒乐属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无所取焉。”但他要求的政治改革，是“随其时而调剂之”，认为“可以更，不可以骤”，害怕冲击得太厉害，仍寄希望于清王朝的“自改革”，最终仍然落到同曹雪芹一样——“无才去补天”。他在弃官南返时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不是凄凉地道出了他的孤臣孽子心情吗？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就是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家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任务，这是在鸦片战争后逐步明确起来的，龚自珍生前并没有来得及把它作为自己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可是因魏源曾在《定盦文录序》中说过龚自珍晚年“尤好西方之书”的话，长期被误认为是他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依据。虽有人曾经指出过，但误者仍误。其实，这个“西方”不是指代表资本主义的西方，是指佛国的“西方”，即龚自珍自己在《题梵册》一诗中说的“西方大圣书”的“西方”。这不只是对一句话的误解，而是牵涉到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进程和龚自珍思想的评价问题。龚自珍在三十多岁时，就已接触佛经，喜欢天台宗，集内第六辑的文章就都是讲佛学的，诗中也有不少读佛参禅的词句。《己亥杂诗》最末一首道：“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法华经》是天台宗立宗传法的主要佛经。龚自珍在这大组叙事抒怀诗写到第三百一十五首，忽然停下了笔，感到无话可说了。他不能向广阔的现实世界寻找改革政治、社会的物质力量，眼前是一片空虚，又无可奈何地回到《法华经》的彼岸世界去找慰藉。

然而“九州生气恃风雷”，终究是龚自珍发出的战斗声音，表现了他对旧事物的憎恨，对未来的展望。鲁迅说：“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革命时代的文学》）。龚自珍去世后十年，太平天国的革命“风雷”震撼了中国大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它们崇奉的孔孟之道。他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这些，就是反儒尊法的龚自珍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表现的积极意义。

# 沈括和《梦溪笔谈》

——《儒法斗争史话》选载之二

韩天宇 王国荣

一〇七二年，王安石变法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新旧两党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这年，一连九个月没下一滴雨，河北平原土地龟裂，灾情十分严重。顽固派司马光一伙幸灾乐祸，整天在朝野上下散布流言蜚语，胡说这是老天爷对变法运动的惩罚，拚命叫嚷“去安石，天乃雨！”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司天监的中年官员力排众议，断然地说：“雨候已见，期在明日。”啊，明天就有大雨！顿时，朝廷上活跃起来，儒生们威胁说：“天意难测，证据何在？要是明日无雨，可是欺君之罪啊！”但那位官员镇静地把自己通过新仪器观测到的气象情况分析给大家听。第二天，果然雷声隆隆，闪电划空，一场倾盆大雨浇灭了旱魃的凶焰，冲刷了儒家之徒散布的谣言。那位预报雨期的便是新任司天监长官沈括。

不久前，王安石罢黜了用所谓“天久阴，星失度”的“天象”来攻击变法的儒家之徒亢瑛，任命沈括接任司天监长官。沈括一进司天监，便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一下子罢免了六个“侈谈玄理”、“拘泥术数”的儒家之徒，破格提拔布衣出身的天文学家卫朴，创造新历法，改进了浑天仪等天文观察仪器，对日蚀、月蚀的成因和月亮的盈亏作了科学的说明。这使那些信奉孔丘陈腐说教的儒家之徒暴跳如雷，他们竟“屡次搦起大狱”，进行政治迫害。沈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用大量的天文资料论证“物理有常有变”，自然界的变化有它自己的规律，根本不存在对变法进行“警告”的“天象”。这样，法家路线指导下的天文研究机构，就成了变法斗争的有力支持。大雨预报，就是一例。

沈括，这位十一世纪的进步政治运动——王安石变法所造就的杰出法家和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始终挺立在变法斗争的前列，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开展科学活动，又用自己的科学活动卓有成效地为法家路线服务。

沈括旗帜鲜明地站在革新派阵营的前列。被顽固派列为沈括第一大“罪状”的，是他积极协助王安石制定免役法。免役法规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大地主必须缴纳募役钱。这是反兼并的重要措施。司马光首先跳出来，在臭名昭著的《答王介甫书》中，大叫免役法“常人皆知其不可”，司马光的死党文彦博更纠集了一千多人进京闹事，反对免役法。在顽

固派的阵阵喧嚣声中，有人问沈括：“免役法颁布已经这么多时候了，民间的骂声至今未绝，这是什么缘故？”沈括明确地回答：“这不奇怪，骂免役法不好的，尽是一些士大夫和富商，他们过去一直享受免役权，现在要叫他们与老百姓一样，他们能高兴吗？”与王安石一样，沈括的结论是：儒家之徒的诋毁“无足恤”！被顽固派列为沈括又一大“罪状”的，是他出使辽庭，与侵略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〇七四年，契丹贵族统治的辽给宋神宗发了一封国书，要北宋满足他们的领土要求，辽的信使蛮不讲理赖在汴京不走，借以要挟。在这种形势下，宋神宗派遣沈括使辽，与敌方谈判，可是件棘手的事。司马光一伙，一听到契丹来闹，早吓昏了，整天围着神宗叫嚷：“契丹入侵，都是变法召来的，快把引起契丹疑心的新法统统罢去，他们就不会来了。”儒生们对付侵略的唯一办法是屈膝投降，他们既不敢战，也不敢去谈。沈括出使的决定宣布后，有人问沈括怕不怕，沈括坦然一笑：“要说怕，只怕自己能力不足，至于个人的生死祸福，早就置之度外了，我决心用生命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宋神宗召见沈括，讨论了有关交涉的一些事后，问道：“敌人居心叵测，心狠手辣，万一中途生变，危害来使，您将何以自处？”沈括坚定地回答：“臣以身许国，宁可粉身碎骨，决不辱使命！”不久，神宗收到了沈括哥哥转来的沈括预先写好的遗奏，上面提供了应敌的良计，并且又一次表示了准备为国捐躯的决心。字里行间，闪烁着法家爱国主义的光辉！沈括在契丹埋伏着刀斧丛的酒席筵上，与侵略者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巧妙地引用辽人自己的文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斗得侵略者瞠目结舌、狼狈不堪。谈判中，有时契丹一方多至千人，沈括依然是胸有成竹，岿然如山。最后出色地完成使命，逼得契丹收回蛮横无理的领土要求。

正因为沈括一直处在斗争旋涡中，所以他敏锐地掌握着王安石变法的脉搏，最理解斗争的需要。沈括是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确定科学研究课题的。他不象那些书斋里的学者，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他所研究的都是政治斗争迫切需要的重大课题，他一生的科学活动始终和政治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斗争需要他研究农业，他就研究农业。早在变法前，沈括任沭阳和宁国县官时，就立志要改变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他研究圩田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主持修治万春圩的工程，开辟了大片良田。圩田工程触犯了顽固派兼并土地的既得利益，他们造谣惑众，气势汹汹地威胁说，“水中有蛟龙，堤岸要崩塌”。为了驳斥顽固派的谣言，他经过深入调查，运用水利学理论的深刻造诣和实际工作经验，写了《圩田五说》，指出圩田堤岸个别地方的崩塌是由于“潭深”，完全可以用措施防止，“非所当怪也”！变法期间，他主持汴河的水利建设。“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当时，流经北宋首都汴梁的那段黄河支流，叫做汴河。它挟带着大量泥沙，沉淀到汴梁的河床，年久淤积，影响京师水路运输。同时，水高于田，经常给人民带来江河横溢的灾害。因此，治汴工程关系到发展交通运输和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反侵略提供物质基础的大问题。这项工程进行两年后，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却引来了司马光一伙的攻击。有人无中生有，捏造淤田淹没庄稼房屋的谣言，

有人冷嘲热讽，说淤田薄得象面饼；甚至朝廷对庆州兵变商议对策的时候，有个家伙竟十分荒唐地把罪责推到汴河淤田上头，当场受到王安石的痛斥。苏轼曾上书神宗，胡说：“汴水这么脏，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不能种稻。现在变法，千方百计修水利，万一堤防决口，洪水滔天，到那个时候，就是把倡议新法者的肉吃了，也无济于事！”但是，沈括不顾儒家之徒的反对，脚踏实地地领导治汴工程。他从汴京上善门直到泗州的淮口止，踏勘、测量了840里130步，这正是汴河最紧要的地段，为了对新法负责，沈括真可谓一丝不苟。他认为单凭水平、望尺等仪器，难免会发生差错，便大胆革新技术，创造出采用“分层筑堰”的新测量法。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是个首创。

斗争需要他研究军事，他就研究军事。一〇七四年，沈括被任命兼管军器监，这是一个为加强国防而设的新机构。加强军器生产，实行军事改革，是王安石变法图强的一大关键。过去，沈括一直当文官，对军事接触不多，但为了加强国防，实现新法，他决心奋发图强，攻克难关。从此，沈括认真攻读古代各种兵书，对军事技术更是刻意讲求，不多欠，包括阵法、城防、兵车、兵器的各门军事战略与技术，他都娴熟地掌握了，并力求上升为理论，编成《边州阵法》和《修城法式条约》两部反映变革思想的军事著作。为了制造“柔薄而韧”的铁甲，沈括亲自深入民间冶锻作坊，特别研究了熟铁和钢的性能。就这样，他在军器监作出了很大成绩，一年多来，精良军器比过去增产数十倍，“可足数十年之用”。后来，沈括到延州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直接承担了对付西夏劲敌，保卫边境的重任。他组织青年练习武艺，举行射箭、骑马比赛，奖励武艺超众者，使延州居民个个学习弯弓射箭，人人爱国热情高涨，边防实力大大增强。第二年，敌寇入侵，狼烟滚滚。沈括亲冒矢石，帅师应战，围上一战，就歼敌七万。为了激励士气，沈括亲自编了“凯歌”数十曲，用士兵中流传的通俗语言填写歌词，教兵士高唱：“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嘹亮的抗战凯歌伴随着胜利的金鼓之声，回荡山谷，直冲霄汉，震得侵略军和卖国贼心胆俱裂。在反侵略战争中，他还研究了牛皮箭套的特殊声学效应，“附地枕之，数里之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他在世界上最早制造了立体地图，这项重大的发明适应了反侵略斗争需要，在与辽的划界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沈括被视为新党余孽，滴居乡间，编于民籍。年近花甲的沈括，来到了镇江的梦溪园，面对青山绿水，壮心不已。他决心拿起笔，继续战斗。他将平日里的见闻谈论，发明创造，参加变法的实践写成文字，汇集成为一本综合性的书，这就是我国科学史上第一部重要著作——《梦溪笔谈》。《梦溪笔谈》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内容涉及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军事和工程技术等十分广阔的领域。

在这本书中，他比较注意发现和记录劳动人民对科学技术的卓越贡献。儒家从孔老二起都鼓吹“上智下愚”，根本看不见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才干。沈括反对这种谬论，他说：“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

预焉。”书中记载着不少普通工人的发明创造。如木工喻皓，是当时人民口碑传颂的一位“匠师”，著有《木经》，可惜这部工匠的著作与封建时代人民的无数创造一样，被地主阶级守旧派无情地扼杀了，只是由于沈括的《梦溪笔谈》，才能使今天的人们知道《木经》的一些论述。又如河工高超，提出自己大胆创新的三节分压工作法，曾遏制住黄河决口的严重自然灾害，在那些专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正史里，根本休想找到这位聪明能干的河工的名字，而沈括却用赞美的笔调详细地写下了他的事迹。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梦溪笔谈》明确而有条理地记述了我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活字印刷的发明，那是当时一位名叫毕昇的布衣首创的，这个伟大的发明，在正史里又是找不到的，《梦溪笔谈》的记载成了有关这方面记载的唯一珍贵史料。

《梦溪笔谈》记述了沈括在许多自然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其中如磁偏角、凹面镜成像、隙积术、会圆术等物理、数学的好几个方面的发现，都比西方早数百年。难怪沈括的研究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要把他称作“科学史上的座标”。沈括察访浙东的时候，攀登温州的雁荡山。站在乱云飞渡的雁荡顶峰，他看见丛岭峭拔，巍峨峥嵘，便合理推测出这些山峰的成因，是由于“谷中大水冲激”，这比英国人郝登的水蚀对山岳成因的理论早六百年。同年秋天，沈括察访河北西路。在高高的太行山上，他发现山崖之间有螺蚌壳和鹅卵石，感慨地说：“这里是过去的海滨啊！现在远离海已近千里了。这么看来，河北平原原来是黄河的泥沙构成的”。这要比西欧的达文西研究地球海陆迁移早四百多年。“人间正道是沧桑”。沈括这些从自然界得出的丰富的科学材料，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王安石“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的正确思想，一次又一次地痛击了司马光之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把沈括的科学活动同北宋的儒法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沈括所以能在十多个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所贡献，是因为他有着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主张变革、前进的政治路线。“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法家的政治路线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儒家的“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和唯心主义自然观，是一切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沈括的每一个科学成就，都是冲破了孔孟之道的思想牢笼，参加了政治斗争才取得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的实践，在各门学科中批判儒家思想的流毒，是很有启发的。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沈括只是找到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作为自己政治和科学活动的指导，而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哲学，并没有能最终摆脱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今天，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指导，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方向，我们一定能够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本文作者系前哨农场、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青年工人）

## 对《论淝水之战》的几点意见

编辑同志：

《学习与批判》杂志1974年第12期刊载的《论淝水之战》一文，是一篇好文章，论点鲜明，分析细致，文字也比较生动活泼。但是，这篇文章在史料上有若干错误，其中不少地方是由于粗心疏忽，如果在查核史料时态度谨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现提出供你们和作者参考。

1. 文中说：“太元五年，苻洛率兵七万叛乱，攻打都城长安”。此事与史实有出入。苻洛没有“攻打都城长安”，只打到中山（今定县）就失败了，离长安还很远。苻洛之乱，其兄苻重也参加了，似应并提。

2. 苻双、苻柳等人“纷纷叛乱”是在太和二年（367年），苻洛、苻重之乱是太元五年（380年），文中把苻双等人的叛乱说成是在苻洛、苻重叛乱以后，显然是把时间搞颠倒了。

3. 东晋设置侨州郡县多数是在交通线上，如广陵（扬州）、京口（镇江）等地，这些地方南方士族势力并不弱。文中说侨州郡县是在“南方士族较弱的地区”，与史实

不符。

4. 文中说“南方士族桓姓”，明显错了。桓氏是侨姓的北方士族，不是南方人。桓氏籍贯谯国龙元（今安徽淮河以北的蒙城县），应当算是北方人而不能算是南方人。

5. 文中说到谢安与“大将军桓冲共事多年”，与史实有出入。桓冲只做到车骑将军，没有做到“大将军”。

谭明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

谭明同志：

你对《论淝水之战》一文所提的意见，我们查核了史料，确实是有某些史料搞错的现象。该文的作者是理论战线上的新兵，这个责任应当由编辑部来承担，主要是我们审稿时粗心大意，责任感不强。你的意见已转告作者，供他在进一步修改此文时作参考，并望你今后能对本刊继续提出意见和批评。

编者

# 战天斗地的杰作

——记上海郊区八百个粮食亩产二千斤以上的高产队

凌 岩 袁夏良

一九七四年，全郊区三百三十万亩粮田，平均粮食亩产一千四百五十斤，其中八百多个生产队的五万多亩粮田，平均亩产超过了两千斤。

两千斤，这是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结出的丰硕经济之果。

两千斤，这是勤劳勇敢的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杰作。

## 高产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

有人说：“粮食要超双千斤，全靠一套‘种田经’（技术）。”这些超双千斤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和干部，通过几年来的亲身经历，却认为第一位的东西还是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奉贤县青村公社姚家大队是个粮食高产的老先进。可是，这个大队的第三生产队，粮食亩产有几年一直在一千四、五百斤的水平上徘徊。什么原因？一查，原来这个生产队有人热衷于靠私人养蜂和公羊挣钱，还说什么“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显然，社会主义正气不发扬，集体经济必然搞不好。一九六九年，广大贫下中农奋起批判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修正主义路线，把这股歪风煞住了。第二年，粮食亩产就从一千五百八十一斤跃到二千零十四斤，后进队抓了路线斗争，就转化成了先进。以后，他们年年抓两条路线斗争，粮食产量年年提高，一九七三年常年亩产达到了二千二百七十斤。

象这样的事例几乎到处都有：南汇县下沙公社沿港大队第四生产队，粮食常年亩产量曾经连续四年在一千七、八百斤上下徘徊，一九七三年他们狠抓阶级斗争，挖出了一个煽动别人扩种自留地的地主分子，社员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这一年的粮食常年亩产一跃而过了两千斤。马陆公社有个生产队，有些人眼睛盯在西瓜、大头菜等收入较高的作物上，施起肥料来，“麦子饿得哇哇叫，还朝大头菜上浇”。后来，大队党支部抓紧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了粮食与蔬菜、瓜果的关系，粮食亩产很快超过了两千斤，其他作物也完成了国家计划。

现在,许多生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都能自觉地认识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性,并且总结了一条经验,叫做“反复抓,抓反复”。围绕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题,每年抓几次大讨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 治水改土的英雄

上海郊区地处长江三角洲,我们站在田头上,一眼望去,绿郁郁的一片大平原。但是,当我们进一步作调查时,发现平原也不都是平的。有的是“出门要行船,下田要摆渡”的柳荡田;有的是野兔出没、七高八低的坟山堆。就是在这些被人们称为“破田”的土地上,广大社员为了大幅度增产粮食,改土治水,不知道洒了多少汗水,战胜了多少水涝和干旱。

青浦县练塘公社林家草大队,地势低洼,土壤粘重,有一半的土地低于水面。解放前,这里原来是个穷水乡,“水来一片白茫茫,水去一片烂泥浆,九年三熟六年荒”,粮食亩产只有二百斤。解放后,农业生产年年上升。但那时,治水改土工作也只是“零打碎敲,小修小补”,一年增产几十斤,到了一九六五年,粮食亩产还不过八百四十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总结了历史经验,认识到“胸无大志怕困难,修修补补步子慢,雄心壮志满胸怀,大干快上夺高产”。他们决心重整水系,使河沟配套。全大队三百个劳动力,从一九七〇年以来的四年中,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就有十万工,先后完成大小水利工程三十五项,土方五十多万,把全大队一千五百多亩柳荡田,改造成为旱涝保丰收的高产稳产田。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粮食常年亩产达到了二千零二斤。

在改土治水的斗争中,妇女社员充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宝山县罗店公社东南弄二队,全队有百分之八十是妇女劳动力。过去,这个队的土地上有三千多个坟墩。广大女社员通过革命大批判,不信神,不信鬼,一鼓作气搬走了全部坟墩,又连续几年平整土地。如今,全队粮食常年亩产已经连续六年超过了两千斤,一九七四年进一步达到二千五百零七斤,比上一年增加了二百四十二斤。

## 他们是这样在积自然肥料

有一次,我们在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的蒋家宅基歇脚,发现这里的宅基周围筑了一道挡水的小堤埂。奇怪,宅基总是要垫得高高的,为什么这里的宅基反而比大田还低?后来,我们听了生产队同志的介绍,才把这个谜揭开了。

原来,当年筑宅基的时候,宅基至少比大田高出七、八寸。但是,近十多年来,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为了增产粮食,把大量的猪粪、河泥和杂草往大田里壅,这样年复一年,就把大田垫高了尺把厚。全队三百零五亩土地堆上尺把厚的肥,这该要多少肥呀?我们从这个队一九七三年的总结材料中看到,这一年:

猪粪,共积一万三千担,平均每亩壅了五千四百斤。

垃圾,年积一万八千多吨,平均每亩壅了六吨。

河泥，年积六万担，平均每亩淤了二百担。

在马陆公社的南马陆生产队，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前几年，那里电灌站的水流不进稻田。当年设计机口的时候，灌溉渠要比耕田高出多少，事先都是计算好的，怎么会打不到水呢？原来也是因为大积自然肥料，把土地垫高了。

上海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同志向我们介绍，金山县八二大队二千多亩土地，有百分之八、九十被有机肥料垫高了六寸到八寸。据他们实地测验，上海郊区的土壤，在一米左右的深度中，有耕作层、淋溶层和淀积层三层。八二大队经过几年来的厩肥改造，土地却有五层，特别是在耕作层下面，多了蓄水性特别好的犁底层，耕作层也比一般的厚三至七厘米。因此，同样是一升土，要比人家的轻四两以上。这就是说，熟土层厚了，通透性能好了。这对水稻增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每年要积上那么大量的有机肥料，没有一股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是办不到的。在八二大队，周围七、八里河港里的水草已经捞完了，他们便撑船到几十里路外去捞。一般的三天捞一船，最远的一星期才来回一次。这样搞下去，不是河泥要闹光，水草要捞完了吗？贫下中农回答我们说，“大地不负勤俭人。这几年利用水面种植的水生作物，光作青饲料，猪也吃不完，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可以用来做草塘泥，今后还可以扩大种植。此外，树叶也是绿肥来源，一棵五龄以上的树木，一年可采树叶二十斤以上。只要我们广开思路，发挥双手的作用，有机肥是不愁没有来源的。”

### 精雕细刻的能手

我们在先进队里看到，为要多增产几斤、几十斤粮食，广大贫下中农千方百计，采取了许许多多、点点滴滴的增产措施。这一点可以先从种麦说起。

过去，郊区农民看不起麦子，说是“种种烂污麦，高产不过二、三百”。这几年，大家在摸索粮食高产的规律中，认识到种麦子夺高产大有可为，并且总结出了“麦子半靠一条沟”的经验。麦沟开得深，麦根扎得深，只要肥料跟得上，就穗大粒重，高产有保证。现在麦田的深沟，一般都在一尺半以上，低洼的地区还达到二尺四寸。不仅要深，为了不多占土地，还要开得很窄很窄，把麦田深沟开得齐齐整整，笔直笔直。

开这样的深沟真不容易。为了开好沟，贫下中农创制了一种象竹叶的长锹，先用一把四寸阔的锹开出沟面，再用三寸阔的锹把沟底的土挖起来。当我们看到麦田里整齐地排列着一道道横沟、竖沟、围沟时，贫下中农精巧的手艺就在脑际浮现出来了。

开沟赢来增产，这是“损失一条线，保护一大片”。但在贫下中农看来，这开沟损失的一条线，也得千方百计把它抓回来。他们派手脚灵巧的姑娘蹲在沟肩上，象绣花一样地种“保沟麦”。这样，既加固了麦沟，每亩还可多收麦子一、二十斤。松江县城西公社金星大队，还实行移密补缺，做到每个垅头上不剩三寸空地，真是做到了“争分夺苗”。就是凭着这种功夫，一九七三年，这个大队的五百十五亩麦子取得了亩产六百十三斤的丰收。

再看看他们花在水稻上的绣花功夫。在灯塔二队，稻种催芽时，育苗小组的同志日夜守候在催芽室里，一天二十四小时，每隔一、二小时就逐缸逐缸地把谷种翻腾一遍，使每粒

谷种受到的温度和水份相等。在田间管理方面，水浆管理员黄昌甫，为了做到“寸水棵棵到，烤田不漏一棵稻”，在从插秧到收割的五、六个月中，他天天在稻田里穿来穿去。有人估计，他每天走的路程至少在三十里以上。

### 实行机械化，高产更有保证了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随着三熟制的普遍推广，为了抢季节，赶进度，劳动力越来越紧张，大家对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体会更加深刻了。但是，要实行机械化，往往要经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在粮食高产单位，就有一种说法，亩产一千斤以下，可以用插秧机；亩产达到一千斤、一千五百斤以上，再要高产，就得用手插。他们说：“高产得来不容易，犯不着冒这个风险。”在嘉定县马陆公社，一九七三年有三十二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达到了两千斤。去年种后季稻时，他们普遍实行了机插。但是，在一九七三年以前，他们那里有“机插高产不保险”的顾虑，并且实行着一条没有规定的规定：高产队不用机插，高产田块不用机插。针对这种思想，公社选了十二块稻田，用同样的种子，一半机插，一半手插，以后，又施同样的肥料，实行同样的管理方法。秋收时，一秤一比较，机插的田块，平均亩产八百五十四斤，手插的田块，平均亩产八百二十四斤，机插比手插亩产高三十斤。经过试验，顾虑消除了，机械化插秧很快得到了推广。事后，他们说，过去只看到机插伤秧多、返青慢的一面，看不到伤秧后秧苗根须扎得深、对后期生长有利的另一面，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作怪。

我们在许多生产队里，看到他们在实行农业机械化以后大量劳动力得到解放的动人事例。过去，一亩麦田开深沟二百四十米，一个强劳动力要花三天时间才能干完。现在，用上了开沟机，一小时可开四百五十米至五百米，比人工开沟提高工效四十倍。去年，金山全县的麦沟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用开沟机挖的。

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一些田多人少的生产队，也能够腾出劳动力精耕细作；田少人多的生产队，则把剩余劳动力用来发展养猪等副业。这样，既增加集体收入，由于猪多肥多，又促进了粮食增产。嘉定县朱桥七队，平均每人只有六分耕地。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面积极发展机械化，一面组织剩余劳动力发展养猪、养兔、养鸡，种植蘑菇和编织柳条等副业。现在，这个生产队已经连续三年粮食亩产超过二千斤，一九七四年达到二千一百七十三斤，生猪饲养量达到每亩五点三三头。全队总收入和集体提留积累都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一倍，社员平均分配收入二百一十元，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一半以上。

### 从选育良种中挖掘增产潜力

这次我们跑到的几个粮食丰产队，一般都比较重视选种育种。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宝山县罗店公社东南弄二队就有这样的经历：过去，这个生产队虽然采用了许多增产措施，麦子亩产量一般只有四百斤。一九七四年开始选种优良品种“早熟三号”大麦，把已经种了十几年的老品种淘汰了，当年就获得亩产九百五十六斤的丰收。我们高兴地看到，“早熟三号”大麦良种，

去年已经在宝山县十五万亩麦田上得到推广,平均亩产五百八十二斤,其中六万八千亩获得平均亩产六百五十斤的优异成绩。

过去,有的生产队往往“种田不着换稻种”——哪里得高产就往那里调种子。这种做法,看起来好象很重视种子工作,实际上收效并不好。嘉定县徐行公社有个永胜十二队,原来粮食产量比较低,后来看到毗邻的永胜十一队粮食亩产连续三年超过两千斤,就以为是人家的种子好,因而年年靠调进种子来播种。但是,现成饭吃了几年,产量还是上不去。什么原因呢?原来是,永胜十一队每年选种,种子的纯度比较高。同时,他们坚持做播种前的浸种消毒工作,增强种子抗病能力。别的队的麦子患黑穗病,永胜十一队就没有发生。去年,永胜十二队也学习推广了这条经验,粮食亩产量就达到了二千零二十五斤。

不少粮食高产队的同志还告诉我们,把人家的优良品种引进到自己队里来,有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这就是说,要从自己队里的土质、气候、肥料等方面的条件出发,摸索出一套相适应的耕作方法来。在奉贤县青村公社姚家十队,我们看到他们对于种子培育、选留工作做得真是细致极了。他们不但坚持采用单倍体、人工杂交等技术培育新品种,而且为了使种子提纯复壮,对于已经试验成功的优良品种,也要坚持把住三道关,才在大田大面积播种:首先是穗选,第二年用来种成一行(穗行圃);用这一行收获的种子,第三年再种成一片(穗系圃);等到穗系圃收上的种子种成“原种圃”以后,所得的种子才在全队普遍播种。几年来,他们坚持年年培育良种,年年选留良种,做到“老种常新”,纯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粮食亩产连续几年保持在二千一百斤以上。

在青村公社,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培育的“双丰”一号、二号等优良品种,而且还看到了新培育成功的后季稻“青梗一号”。这个品种不但单产可以达到一千三百斤以上,而且抗病力强,成熟期早。公社准备今年在更大面积上推广。

### 产量要上去,农本要下来

在这次调查以前,我们曾经听人说,既要产量上去,又要农本下来,好比一只手捉两只蟹,是办不到的。可是,我们却看到了“一手捉住两只蟹”的生产队,那就是青浦县徐泾公社徐泾八队。一九七四年,这个队粮食亩产二千四百九十二斤,比一九六五年(七百零五斤)增加了二点五倍。但每亩农本在收入总额中的比重,却从原来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三下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九点六。

能不能做到农本不断下降,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坚持开展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坚持发扬勤俭办社的革命精神。这是徐泾八队的一条经验。过去,这个队里有些人认为,“只要产量上层楼,不怕农本高过头。”对节约农本不够重视。后来,他们结合检查了浪费现象,进行勤俭节约的思想路线教育,认真抓好施肥和治虫占农本较多的两个环节,结果,不仅降低了农本,而且进一步提高了粮食产量。例如,过去,猪、牛粪是从棚舍里清出来直接往田里施的,现在,为了提高肥效,要沤一下再施。这样,没有多花一分钱,肥效却大大提高,做到了一担肥抵两担用。过去,三麦抗旱浇水,每亩都要加五十斤氨水;现在他们改用牛尿,肥效相仿,成本则节省大约三分之二。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他们也总是加强调查

研究,哪里有虫情病情,就在那里施药,努力做到治得早,治得准,有的放矢。由于他们精打细算,讲求实效,因此,花钱少,防治病虫害的效果也比较好。

实际上,就是象徐泾八队那样农本比较低的单位,要进一步降低农本的潜力还是很大。据这个队的同志自己说,他们在农机具的管理上还有不少缺点。远的不说,就同本大队第一生产队相比,一九七三年农机修理费,八队高达六百多元,而一队只有一百九十元。八队的同志表示: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做到产量继续上去,农本不断下来。

### 在新的起点上奋勇前进

粮食亩产超过了两千斤,对八百多个高产单位来说,这仅仅是革命征途中的新的起点。这些高产队的许多同志遵照毛主席“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教导,正在不断总结新的经验,摸索高产规律,努力夺取新的胜利。这可以从他们广泛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的事实得到证明。

认真种好试验田,是许多高产单位探索高产规律的有效办法。嘉定县灯塔二队有这样一块丰产试验田:试验田上采取的科学种田方法,第二年就在全生产队普遍推广;试验田上取得的高产成绩,也就成为全队的增产指标。一九七一年,试验田进行早稻一季亩产超千斤的试验,得到了成功,第二年,全队早稻一季亩产也达到了这个水平。一九七二年,试验田实现了粮食两熟亩产超两千斤,过一年,全队粮食常年亩产也达到了二千一百八十斤。一九七三年,试验田粮食亩产创造二千七百斤的新纪录,一九七四年全队粮食亩产实现了二千四百零七斤的好成绩。这真是一块名符其实的“样板田”。

现在,许多生产队除了认真种好综合试验增产措施的“丰产田”以外,还有各种各样进行单项技术措施的试验田,如:进行浅施、深施,肥种搭配的施肥试验田;水稻的密植、水浆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的试验田,等等。不少生产队在群众性的科学种田活动广泛开展以后,干部和群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分别种起了试验田,如:“队委会试验田”、“贫协小组试验田”、“十姑娘试验田”、“三老汉试验田”,等等。八二大队种试验田的人数达到全大队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试验田、丰产田和种子田的面积约占全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在这些试验田上,大家相互交流技术,总结丰产经验,试验田已经成为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最好的场所。

当结束这篇调查散记的时候,我们不禁想起,粮食常年亩产双千斤以上的丰产队,在全市郊区二万八千个生产队中,毕竟只占少数。但是,全市郊区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很高的,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们正在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开展农田基本建设,重新安排山河,迅速改变面貌。看了广大社员这种革命永无止境、生产永无止境的豪迈革命气概,谁个还会怀疑: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广大贫下中农,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赢得粮食更大幅度的增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呢?

# 医疗器械用上了 先进的技术成果

## ——上海市发展精密医疗器械工业的调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推动下，上海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协作，努力发展精密医疗器械工业，从而改变了过去主要是生产刀、剪、钳、镊“四大件”和注射器、消毒器、听诊器“三大器”的落后局面。在一九七二年以来的短短三年时间里，全市医疗器械工业试制成功了一百多种精密医疗器械，有一半以上采用了电子、同位素、超低温、激光、纤维光学、核子等新技术。其中有诊治癌症、心脏病的精密设备，有灵巧的电动、风动胸骨锯、骨钻、开颅器等器械，还有用电子控制和记录的分析化验仪器等等。精密医疗器械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更好地发展人民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为什么过去上海医疗器械工业的落后面貌长期不能改变，这几年却能够如此高速度、高水平、多品种地发展？工人们总结自己的经验，说：“这是革命形势逼出来的，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影响斗出来的，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干出来的。”

医疗卫生革命的深入发展，向医疗器械工业不断提出了新的迫切的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纷纷组织巡回医疗，分批奔赴边疆、农村，过去在城市医院中长期沿用的比较笨重的医疗器械，现在要爬山涉水，就搬不动，显得不相适应了，这就向医疗器械工业提出了尽快试制简便、灵巧的新器械的要求；在开展大规模普查、普治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工作以后，过去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进行化验、诊断的办法也不适用了，而是迫切需要有操作方便、效率高的新的诊断仪器。医疗器械工业的广大工人和干部，在医疗卫生革命的推动下，为了迅速改变生产技术的落后面貌，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下，纷纷到医院去访问，看看医生们是在使用什么器械，了解他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器械来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在一家医院里，他们看到医务工作者正在成功地把针刺麻醉应用到开胸手术，但是；手术用的器械却还是“鲁班式”的锤子、凿子、锯子。医生在手术台旁累得满头大汗，而病人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清晰地听到锤子、凿子在自己身上一下一下地捶打。工人们说：“这一锤一锤正是敲在我们医疗器械工人的心上呀！”他们在医院里还看到，医生们正在使用的一些理疗和诊断器械，不少都是已经用了几十年的落后设备。工人们坐立不安了，表

示要立即动手，尽快地用先进器械去武装医疗卫生事业。

在农村中，县和人民公社卫生院的医务工作者和贫下中农告诉他们：现在全国还有不少公社卫生院没有X光机，贫下中农看病要“照一次镜子”，就得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地到县卫生院去。同时，许多县卫生院进行上腹部手术需要有容量较大的X光机，而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却还没有开始生产这类产品，特别是当工人们听说外国资本家乘机成倍哄抬大容量X光机的价格时，当场批评干部：“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情况告诉我们？”

调查访问是一次有力的动员。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医疗卫生战线的实际需要为发展医疗器械工业提出了奋斗方向。医疗器械工业的广大工人和干部奋发图强，把各种新技术应用到医疗器械上去，使精密医疗器械的生产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医疗器械上采用先进的技术，当然会有许多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医疗器械工业底子薄，技术差，不少工厂是“破庙、搁楼、灶披间”，设备是“老爷机器摇舢板”；而且，发展精密医疗器械需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光依靠医疗器械工业的自身力量来搞，是有困难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医用光学仪器厂曾经想试制一种用来诊断早期胃癌的“三用胃镜”，由于它涉及许多新的技术学科，再加上厂内只是依靠少数人关门搞试制，结果，搞了六年，一事无成。正如工人们说的：“关门搞试制，越想困难越多；放眼看全国，越看办法越多。”事实正是如此。在八年以后的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个厂重新试制三用胃镜时，由于得到了各行各业的积极支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胃镜中用的玻璃材料，要求所含杂质低于五百万分之一。这样高纯度的玻璃材料，现成的找不到。这件事被新沪玻璃厂的工人知道了，他们主动承担了此一协作任务。在熔炼过程中，工人们不避呛人的硝酸烟气，连续烧坏了十多只坩埚，终于把合格的高纯度玻璃材料试制出来了。胃镜要用不发热的冷光新光源，这项新技术不久前才在彩色电影工业部门试制成功，他们就把它移植过来。小小的三用胃镜，就是这样依靠全市七个行业、四十多个单位的通力协作，经过三个多月奋战，终于试制成功了。

三年来试制成功的一百多种精密医疗器械，几乎没有一种不是得到各行各业支援的结果。医生需要有一种效率高、损伤少的手术器械，医疗器械工业就把机械工业加工钢铁零件的激光新技术借用过来，试制成功用于治疗眼耳鼻喉科、妇产科肿瘤的医疗器械。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上已在采用的深冷新技术，也可以用来制造手术器械液氮冷刀，使医生在手术时，能够达到效能高，病人无痛、不出血，视野清晰。在各行各业支援医疗器械工业发展精密医疗器械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许许多多动人的先进事例。沪东造船厂工人到劳保医院去看病，听说医生为了减轻工农兵病员在手术时的痛苦，渴望甩掉锤子、凿子等落后工具，用上先进的劈胸手术器械。他们回厂后，两个星期功夫就试制成功了一台电动手术锯，送到医院去，使医生的劈胸时间从过去的二十分钟缩短到一分钟。中国纺织机械厂在承担冠心病动态诊断仪的部件——活动地板的试制任务中，为了搞好调档速度，动员了厂里几十名不同体重、身长和不同年龄的工人反复进行试验，寻求正确的数据，使试制的产品更加适合实际的需要。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预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

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各行各业支援医疗器械工业采用新技术的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为新技术的创造和推广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但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协作关系,才能把创造和发展新技术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把各种先进技术应用到医疗器械上去,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别的工业部门,许多新技术的工作对象都是金属、木材,而医疗器械则是用在人的肌体上的,有着特殊的要求。因此,在医疗器械上应用先进技术,就必须实行医疗卫生部门、工厂和科研单位三结合,对新技术进行“再创造”。医疗器械工人和研究人员在采用激光新技术试制骨科手术器的过程中,就有过这样的体验:钟表元件工业已经成功地用红宝石激光进行钻孔加工,但是一用到医疗器械上来,却只能切开动物的皮肉,啃不动骨头。为什么红宝石激光可以在坚硬的金刚石上打孔,却不能切割硬度较低的骨头呢?原来是红宝石激光的光束不易被白色的骨头所吸收。后来,他们同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医生相结合,试验采用别的激光材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接着,他们又经过反复试验,先后克服了聚焦点的移动和深度不易控制等困难,使激光手术器的试制工作取得了成功。他们还装上导光器,使激光手术器更加适合于临床操作的需要。

精密医疗器械既然是为我国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就必须总结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精密医疗器械。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工厂、医院和科研单位各吹各的号,互不通气,工厂只管生产,不了解产品的使用情况,也听不到医生的意见。医院只管使用,产品合用我就用,不合用我就去进口。而有些受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毒害比较深的人,生搬硬套外国产品的设计,结果往往闹出了笑话。例如:欧洲人鼻腔长,中国人鼻腔短,进口的医用鼻腔镜是按照欧洲人的鼻型设计的,有个单位却依样画葫芦地进行仿造,结果生产出来的产品放不进中国人的鼻腔而不能使用。这些事实说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不肃清,医疗器械工业就不能迅速发展。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工人和医务工作者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建立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医生在医疗实践中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器械,对医疗器械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及时向工厂反映,工厂在试制新产品的过程中,也主动征求医生的意见,使产品不断改进。去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医生陈中伟,收到了外国资本家寄来的一包微型缝合针样品,并且写信夸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产品。还说,你们既然已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断肢手术和断指手术,就应该用上他们厂生产的手术器械。陈中伟等医生拿着这封外国资本家的信和缝合针样品,分别到了上海手术器械二厂、手术器械六厂和上海医用缝合针厂,向这几个厂的工人说,我们外科医生多么想用国产微型手术器械进行断指手术呀!这件事对工人触动很大。他们二话不说,决心要在最短时期内填补我国医疗器械工业这一空白,而且不是象外国人吹嘘的那样只有几把,而是要有完备的一套,让医生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工人们说到做到,硬是用“铁杵磨成针”的功夫,分别试制出比头发还细的血管缝合针等成套微型手术器械。后来,当工

人们听说外科医生用上国产的微型手术器械以后，断指接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时，同医生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医生也不单纯是医疗器械的用户，他们热情地关心工厂的试制工作，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实际上是试制工作的直接参加者。特别是当有些精密医疗器械刚试制出来还存在缺点的情况下，医生坚持使用，在使用过程中，针对暴露的矛盾，提出改进意见和实际要求。这对工厂进一步搞好试制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眼耳鼻喉科医院医生同工人、科研人员一起协作试制激光手术刀，刚试制出来时，使用很不顺手，做完一次手术，就累得满头大汗。但不少医生认为，这是精密医疗器械的新生事物，我们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一定要当好社会主义促进派，坚持扶植新生事物茁壮成长。他们一面勤练手法，努力把新的手术器械用好，一面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改进办法。现在，这种激光手术刀依靠医生的支持、协作，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医生进行手术时，可以象握钢笔一样运用自如了。

为使精密医疗器械更好地按照中国人的体质和体型进行设计，还要到城乡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取得大量的数据资料。在设计制造精密医疗器械的过程中，广大工人和医务工作者为了掌握一种数据，往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上海手术器械五厂工人听说妇产科医生普查早期宫颈癌，需要一种采用萤光素显影的诊断仪器，就决定动手试制。萤光素过去只是用于染料、电真空等工业，究竟能不能用于检查人体病变？萤光素有二、三十种，究竟哪一种才用之有效？医疗器械工业工人和医务工作者怀着“为千百万劳动妇女的健康着想”的无产阶级感情，工人上医院同医生一起观察早期宫颈癌病人的病情，研究不同种类的萤光素对各种活体标本的反应，同时还得到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支持，测试各种数据。为了掌握萤光素的适当剂量，十几个医生还主动在自己身上作试验。依靠工人和医生这样的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前后两个月，第一台结构简单、携带方便、能够发现早期宫颈癌的萤光诊断仪终于试制成功了。以后，他们又精益求精，进一步在诊断仪上用上了电子技术，使之能够自动扫描、摄像和记录，效率更加提高了。

在试制各种精密医疗器械的过程中，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同几十个工厂、医院建立了经常的挂钩联系制度，并且有一半以上的研究人员，带着仪器设备下厂，同工人一起进行设计、研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上海工人阶级发展精密医疗器械工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这些成绩，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比较起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广大医疗器械工业工人决心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彻底批判旧思想、旧制度的残余，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并且以高昂的战斗精神讨论制订长远规划，一定要为精密医疗器械工业进一步向先进水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市医疗器械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话(续一)

## 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恶性循环

甲：你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这是很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就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建立，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存在了。但是，为什么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直到一八二五年才在英国开始爆发呢？

乙：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一点很重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什么要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在英国开始周期性地爆发呢？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分析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停滞状态时指出：“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初期，局部的、个别的生产过剩现象是经常出现的，但这种生产过剩要发展成为“定期重演的危机”，即成为一个国家各行各业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有一个从局部量变到全局质变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资本主义工业在它早期的一、二百年内，还只是手工操作的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手工工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速度还并不是很快的，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虽已存在并发生作用，但矛盾还没有激化，生产过剩还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现象。随着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竞争的发展，资本和生产日益集中，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分工越来越细，逐步地导致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经过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手工工场发展成为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膨胀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开始激化了，各个部门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当我们讲一八二五年在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的时候，就是指的这种各个工业部门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至于局部的个别的小危机，那是在一八二五年以前早就不断发生了。

甲：你在上面引证恩格斯的那一段话里，讲到“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我想，这

大概是指在一八二五年英国爆发的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后，每隔一定时期，就会重复出现这种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年年存在、月月存在的，而经济危机却不是年年爆发、月月爆发，而要经过一定的时期才重演，这又应该怎样理解呢？

乙：这里涉及到危机的周期性问题。所谓危机的周期性，就是指从上一次危机开始到下一次危机开始这段时期。例如，一九二九年开始爆发了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从一九三三年起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从危机中爬出来，隔了不久，到一九三七年又爆发了另一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八年就称为危机的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中，一般要经历危机、萧条（或停滞）、复苏和高涨（或繁荣）四个阶段。

危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它是上一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周期的起点。危机通常是在经济最“繁荣”的时候突然猛烈爆发的。在危机到来之前，总的说来，市场上似乎是一片“生意兴隆”的景象：商业资本家大量进货，工业资本家开足马力生产，银行资本家发出大量贷款。其实，这时的生产早已超过了社会的购买力，有些生产部门已经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破产了，只是由于商业、信用制度和投机活动等所制造的虚假繁荣，生产过剩暂时还被掩盖着。但是，纸包不住火。由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虚假繁荣，决不能把生产过剩长期掩盖起来。当矛盾达到顶点时，危机就总爆发了。商业资本家争着要使他们手中的商品出笼，不愿再行进货。这时仓库里存货增加，销售困难，股票价格猛跌，生产大幅度下降。许多中小企业首先大量破产；不少银行跟着倒闭，即使没有倒闭的工厂也紧缩生产，使失业工人人数大量增加。这样一来，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就象害了一场瘟疫，突然陷入瘫痪之中。但是，危机是否会永远持续下去呢？不。产生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虽然年年存在、月月存在，但经济危机却不是年年有、月月有。这是因为危机持续一段时期以后，通过强制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社会上积存的商品逐渐减少，生产同消费逐渐趋向相对平衡。这时，生产下降就会开始停止，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逐步从危机中爬出来，逐步从危机阶段过渡到萧条阶段。

萧条是进入复苏和高涨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经济危机的急风暴雨般的袭击以后，工商企业倒闭的浪潮慢慢平息下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停滞状态。生产和消费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这时，过剩的商品经过一段时期的销售，存货逐渐减少，商品价格缓缓回升。资本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追求利润，一面加紧剥削工人，一面采用新设备、新技术，开始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更新，推动了许多部门的生产增加。这样，市场有了转机，定货逐步增加，资本家看到有利可图，又开始进行着新的投资，生产逐渐恢复起来。于是，社会经济就由萧条阶段进入复苏阶段。

复苏是周期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生产逐步扩大，社会对商品的需求逐渐增加。由于资本家扩大生产进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需要大量的生产资料，这就会促

进电力、钢铁、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促使就业人口增加。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就业人口的增加，又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从而刺激粮食、衣服、日用品等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这时，商品价格上涨，利润迅速增加，整个社会经济好象一个人病后经过疗养，从瘫痪中爬起来了。这就标志着复苏阶段进入了高涨阶段。

高涨是下一次危机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不断扩大，甚至突破危机前的最高点，继续向前发展，资本家的利润急剧增加，旧企业迅速扩充，新企业不断涌现。商人大批进货，物价高涨。银行也乐于贷款，信贷异常活跃。资本主义经济又好象“烈烈轰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这种表面繁荣掩不住“内囊”的腐败。因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继续发生作用，随着生产急剧扩张而来的是劳动人民购买力的相对缩小，一场新危机又在酝酿着了。由于盲目扩大生产的趋势同购买力相对狭小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必然愈来愈尖锐，这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终于不可避免地又要重新来临了。

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体现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它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破坏和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周期性正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种表现。

甲：你刚才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这个问题很重要。你能不能再进一步作些分析？

乙：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的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工资、价格和利润》）因此，我们说一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一个循环要经历的四个阶段。离开这四个阶段周而复始地循环，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正是通过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恶性循环，来否定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的。他们往往抓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年年有、月月有这一现象，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中暂时出现“繁荣”这一现象，尽量夸大，不及其余，替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这种卑劣手法，曾经受到列宁的痛斥。列宁指出：“在危机论和崩溃论的问题上，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是客观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是在一九〇八年说这些话的。六十多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不断爆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完全证明了列宁的科学预见。只有彻底背叛列宁主义的苏修叛徒集团，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爆发的一九七四年，还祭起老修正主义者的破旗，硬说这次危机不是危机，只不过是“高涨阶段的暂时中断”，明目张胆地妄图“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基础”！这些家伙连《红楼梦》中的贾元春都不如。贾元春尚且能在封建社会“烈火烹油，鲜

花着锦”的时代,看到这个社会行将崩溃的败象,做了一则爆竹的灯谜:“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元春把那时的封建社会譬喻为爆竹,意思是它的外表尽管显赫,一旦爆炸就会灭亡。修正主义者被资本主义生产暂时出现的繁荣迷了心窍,散布资本主义万古长存的神话,但是现实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恰恰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甲:是这样。当前这场经济危机给帝国主义的打击确实很大,给修正主义的打击也很沉重。现在我还有个问题请你分析一下,就是经济危机的周期过去大致上是十年左右爆发一次,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要多少年爆发一次,不是怎么算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前,平均每隔十年左右,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影响这个周期长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知道,资本家要进行生产,需要拥有机器、设备、厂房等固定资本;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是一次就被消耗掉了,而是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全部被磨损。机器、设备、厂房都要在生产中使用多年才更新。一般大机器,如果光从物质磨损过程来看,有的可用二、三十年才会全部磨损。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只是有物质磨损(或叫有形损耗),而且还有精神磨损(或叫无形损耗)。所谓精神磨损,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原来的一台机器从它的实物形态上来看,虽然尚未全部磨损,但是比它效率更高的新机器造出来了,资本家如果固守自己的老牛破车,就要被采用新机器、新技术的资本家打垮。激烈的竞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把原来尚可使用的旧机器废弃不用,更换新的机器,掀起更新固定资本的热潮。这种由于采用新机器而使原来尚可使用的旧机器报废不用而发生的损失,叫做精神磨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十九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本更新的材料作了科学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资本论》第二卷)固定资本的更新,为什么会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物质基础呢?这是因为,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必然引起对生产资料的需要量的扩大,推动生产资料的生产。随着生产资料生产的扩大,又必然引起对劳动力需要量的增加,这就推动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从陷入危机的状态中逐步走上了高涨的状态。但是,当走上高涨状态的时候,生产量超过了需要量,危机就又到来了。危机以后在从萧条到复苏的转变关头,资本家又都想通过革新技术、降低成本来占领市场,又会引起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从而又为下一次危机的爆发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在看待固定资本更新周期和危机周期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注意两个问题:首先,马克思曾经指出:“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

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资本论》第一卷)。其次,固定资本的更新,只是危机周期的物质基础,决不能把它说成是引起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原因。因为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那末,就不会有经济危机,也就不发生经济危机周期性的问题。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原因,同危机发生的原因一样,是由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

甲:马克思说的:“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发展情况正是这样,周期大大缩短了,从战前十年左右爆发一次到战后五年左右爆发一次,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乙: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周期是大大缩短了。美国到现在已爆发了六次,日本爆发了七次,每次平均都只有四、五年时间。战后经济危机的周期为什么会缩短?总的说来,有以下一些原因:第一,根本的一条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提高,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越来越集中于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手里。在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劳动人民受到愈来愈严重的剥削,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于生产增长来说差距越来越大,国内市场问题更加严重。第二,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采用凯恩斯的理论,以所谓国家干预,赤字财政,国民经济军事化等办法,作为反危机的一种措施。这种措施,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在以往爆发经济危机时,矛盾展开比较充分,经过危机的剧烈破坏,使社会生产同消费之间的矛盾强制地得到解决,由此建立的相对平衡就比较地能够持久一些。因此,危机周期时间也就比较长。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垄断资产阶级采用了凯恩斯所谓反危机的措施,使资本主义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就被压下去了,这就使下一次危机很快接着爆发。第三,是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第三世界的不断觉醒和壮大,帝国主义国家国外市场相对地在不断缩小,使转嫁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少,这就迫使危机周期更加缩短。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的缩短,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具有周期性,那末是不是会永远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呢?

乙: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地爆发,决不是简单的重复。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反杜林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恶性循环。每经过一次循环,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都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地动摇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着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本节由陶友之撰写)

# 国际扒手的真相

## ——评最近两年苏修对外贸易

上海师大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威士毅

当前，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风暴正在猛烈地冲击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摆脱自身的经济困境，也在利用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趁火打劫，从中渔利，扮演了一个国际大扒手的丑恶角色。

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苏修近年来一面大叫“缓和”，一面向世界各国积极兜售数量庞大的武器。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苏修出售军火累计达二百八十五亿美元，平均每年十六亿七千万美元。自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爆发以来，仅供应叙利亚的武器即相当于二十亿美元左右。一九七四年同利比亚又达成了一笔十二亿至十五亿美元的武器交易。西方和日本报刊的评论，都认为“拿到了巨额石油美元”的中东国家成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兜售武器的焦点”。

这些源源流入苏修腰包的石油美元，每一块都饱含着阿拉伯人民的血泪。一向以阿拉伯人民的“天然盟友”自居的苏修，在中东十月战争期间，乘机提高武器价格，并拿着阎王簿逼债，强迫阿拉伯国家用削价的石油或美元付款。“仅阿尔及利亚就为应运给埃及和叙利亚武装部队的武器付给莫斯科两亿美元”。这些钱，正如列宁在揭露当年美帝时所指出的：“每一块美元都有污迹，都有使每个国家的富人发财、穷人破产的‘有利可得的’军事订货的污迹。”（《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88页）

苏修不仅是一个国际军火商，更是一个国际石油投机商。苏修外贸部的头目们就厚着脸皮说过：“指控苏联‘背着阿拉伯国家’，……趁机出来利用目前危机渔利的说法是谎言，是追求丑恶目的的。”这真是自欺欺人，活象一只头埋在沙堆中而屁股耸得老高的鸵鸟。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人民实行石油禁运，以反击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苏修呢，口头上表示支持，暗地里却把石油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和其他列入禁运名单的国家。一个美国资本家夸奖说，“我们同俄国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甚至在禁运的时候，我们一点也没有感到他们考虑要断绝对我们的供应。”当荷兰被列

入石油禁运名单上时,苏修还特意对它增加了石油出口量。更恶劣的是,苏修利用阿拉伯国家暂时的困难和欧洲国家能源短缺的机会,一方面逼迫阿拉伯国家以廉价石油支付苏修出售军火的欠款;另一方面又“背着阿拉伯国家”把这些石油以高价卖给欧洲国家,牟取暴利。例如,伊拉克曾被迫以削减的价格向苏修出售价值六百万英镑的石油以支付部分军火费用,苏修立即以一千八百万英镑的价格转卖给西德。一进一出,获得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一九七三年,苏修通过这种卑劣手段,从中东等地进口了一千四百多万吨石油。此外,当石油局部禁运一生效,苏修就马上把油价提高。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指出:苏联卖给几内亚的石油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百五十多”。据西方报刊估计,一年多以来,苏修通过转卖和出售本国石油捞到的不义之财约为三十七亿美元。一九七三年苏修向西方出口石油三亿五千二百万桶,如果全部按合同付款,苏修将获得十亿零五千万美元的价款;但由于石油涨价,苏修实得十七亿美元,即多捞了近七亿美元。苏修一九七四年对西方的出口即使不超过一九七三年的数量,赚得的钱仍将增加近三十亿美元。这笔钱等于一九七三年苏修向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一半。苏修在石油贸易上的丑恶表演,暴露了它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心怀叵测、两面三刀、极其凶险的敌人。

在天然气方面,苏修同样大搞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投机倒把勾当。据报道,苏修从伊朗等国家廉价购买约一百四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中,至少有一百二十亿立方米是中途改道输往西欧的。在调整价格之前,苏修从伊朗进口天然气的价格是每立方呎十九点五美分,转手即以四十五美分的价格卖给西欧国家,从中获取暴利。

苏修从武器买卖和出售石油中所获取的暴利主要是用来购买西方的先进技术装备,以加速扩军备战,并为其糟透了的国民经济打强心针。据《英国经济评论》季刊的统计,一九七三年苏联同西方十一个贸易伙伴的贸易额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了46%,同年苏联和西方各国的贸易逆差为十一亿三千万美元,“如果不是在该年年底莫斯科方面提高了它的石油价格,那末这个逆差的数字还会更大一些”;同时又由于它出售武器和掠夺第三世界,一九七三年,“总的说来,苏联在对外贸易中还捞到三亿卢布的盈余”。估计一九七四年它同西方的贸易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西德的贸易额将由九千亿法郎增长到一百五十亿法郎,同法国的贸易额将从四十五亿法郎增加到五十五亿法郎。而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一九七四年苏联同西方的贸易大概会出现顺差,总额将达十五亿至二十亿美元。因此,美国《商业周刊》评论说:“俄国人幸运的是,他们有钱来支付他们立即需要的设备。他们现在向西方出口黄金和石油,向中东国家出售武器,可以赚更多的钱。”苏修现在开始以一个暴发而又“贪婪的伙伴”(法国《世界报》语),敲着叮当作响的美元,同西方资本家挤眉弄眼,讨价还价,大做“现金交易”。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过去苏修从西方购买设备总是只肯给“百分之十的现金”,而现在“忽然拿出百分之百的现金”,“每一项四百万美元以下的交易中,都可以从俄国人那里得到现金”,甚至从西德财团进口价值十二亿美元的技术

设备,也“突然宣布他们要分期付款”。

在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苏修同美帝展开了一轮新的贸易战和资源战。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又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810页)今天,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都妄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也都极力想控制实力不如自己的发达国家。苏修在把东欧置于自己的附庸地位以后,它又想方设法竭力排挤美国在西欧各国的势力。它利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时期的困难处境,挥舞石油和天然气的橄榄枝,唱着“全欧合作”、“全面实业合作”等娓娓动听的曲调,相继同奥地利、法国、西德、芬兰、英国和意大利签订了长期的经济、科技和工业合作协定,同芬兰、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缔结了供应天然气的二十年的长期合同。据日本报刊报道,一九七四年供应芬兰的天然气为五亿立方米,二、三年以后每年将达十四亿立方米;一九七三年开始向西德供应天然气,估计一九八〇年将达七十亿立方米;一九七四年开始供应意大利天然气,最高时每年达六十亿立方米;一九七六年开始每年供应法国二十五亿立方米。这些美其名曰“全面实业合作”的协定和合同,实质是要把西欧“合作”到它的势力范围内去。一九七三年西欧石油供应紧张时,苏联答应对西德增加石油供应,但必须以西德削弱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为条件;它又威胁冰岛,说是要想继续得到石油供应,就必须拒绝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设立基地。因此,所谓“全面的实业合作”,根本不是什么橄榄枝,而是苏修手里一根向西欧国家挥舞着的大棒。西德《明镜周刊》写道:“能源危机把一个额外的对波恩施加压力的工具送到了苏联人的手里,虽然增加供应已达成协议,但是流入联邦共和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仍然很少”。

苏修到处挖美国的墙脚,打进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美帝是不会甘心的。苏修拚命打进西欧,美帝则竭力向东欧渗透。据美国官方宣布,一九七三年美国对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的输出总额,比一九七二年增加了一点二倍。美帝正在对东欧的原料、机械、汽车、化学品市场展开全面进攻。美苏两霸,尔虞我诈,互挖墙脚,双方争夺得好不热闹!

苏修、美帝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突出地反映在中东石油资源和武器市场的争夺这一点上。苏修因为无力开采自身的石油资源,不惜低声下气地到西方去招徕投资,乞求技术合作,那末,它又为什么要借工本,大下赌注,向中东国家进行“经援”和“军援”呢?苏修每年输出几千万吨的原油,为什么又要在中东大搞“武器换石油”、“机器换石油”的勾当呢?这除了它企图转手倒卖,牟取暴利之外,主要还是服从于它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这个不变的目标的。对中东的争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从侧翼同美帝争夺欧洲这块肥肉。日本报刊指出,苏联接近中东,“重点不是出于获得石油资源这种经济要求,而是通过中东的

石油资源,建立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有利地盘”。目前,中东的石油生产有一半控制在美国垄断资本手中。这些石油不但供给它的盟国的需要,而且越来越多地输入到美国去。如果苏修取代了美帝的地位,它将卡住依赖中东供应石油的西欧和日本的脖子,正如一家西方报刊所说:“谁占有石油,谁就控制世界,特别是控制靠东方提供石油的欧洲。”正因为如此,苏修才把它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总额的大部分集中在中东地区。同时,苏修西出地中海,南下印度洋,中东都是必经之地。苏伊士运河一旦开放,中东的战略地位就更形增强。因此,苏修同美帝的争夺也就愈演愈烈。苏修要在某一个靠近红海的阿拉伯国家铺路,美帝马上就要接上去铺另一条路。美帝答应为埃及安装一个核反应堆的协议尚未执行,苏修就迫不及待地也同意提供一个核反应堆。西方报刊在评论这一点时指出:“这是一个损害美国”,旨在恢复俄埃“密切关系的步骤”。归根到底,苏修在中东搞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同美帝争夺中东霸权,进而控制中东同美帝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

苏修的对外贸易是它同美帝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的测试计。它把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贸易总额集中在欧洲,说明了欧洲是它同美帝争夺的重点。它把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的大部分集中在中东,这又说明了中东是它从侧翼窥伺欧洲的战略要冲。

当前世界经济中突出的问题,除了石油以外,便是粮食。在粮食问题上,一向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修,竟然连年歉收,养不活自己,要跑到世界粮食市场上去大肆抢购。由于苏修在一九七二年抢购三千万吨左右的粮食,造成世界粮食价格象脱缰了的野马,不可遏止。结果使美国小麦储备量降低到了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并损失了三亿七千万美元。美国朝野上下,都骂“俄国人太狡猾了”,简直是“对美国的‘抢劫’”。一九七四年苏修趁美国遭受严霜袭击之后,又意图继续依法炮制,再抢购三百四十万吨粮食。美国政府马上出面干预,从而大大降低了苏修的粮食购买量,演出了一幕两霸“争食”的活剧。

毛主席指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近一两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对外贸易,大搞扒窃活动,到处敲诈勒索,并且自以为得计。其实,以损人的目的开始,必将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是一切反动派所摆脱不了的命运。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经济危机导致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投资场所的竞争尖锐化,这种日益加剧的贸易战和资源战往往促使新战争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条件成熟起来。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促进了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俄战争的爆发。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促使了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今天,苏美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剑拔弩张,他们争夺到哪里,那里就成为多事之地。当前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就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斗争。世界大战的威胁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 阿拉伯国家石油斗争的前前后后

秦 正 先

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开始，阿拉伯国家和人民拿起石油武器，掀起了意义深远的石油斗争。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创举。一年以来，在石油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日益觉醒，掀起了维护国家主权、掌握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剥削和掠夺的巨大浪潮。

## 石油斗争的由来

中东是世界石油宝库，这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发现有石油。在这个长一千二百英里、宽五百英里的广大油田地带内，蕴藏有六百一十多亿吨的石油，占资本主义世界已探明的石油蕴藏总量的三分之二。中东石油的生产量在一九七二年是十亿零七千三百万吨，占资本主义世界石油生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一·三，超过了美、苏两国产量的总和。中东的石油开采成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最低的。在美国开采一吨石油的成本要九点七二美元；而在科威特则只要零点四六美元；在沙特阿拉伯钻探石油的费用，只有美国国内钻探石油费用的三十五分之一。中东的沙漠每时每刻都在为帝国主义喷射出大量石油利润。

中东的石油，不仅是帝国主义的摇钱树，而且还是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重要动力来源。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就公开说过：“舰队的移动，部队的调遣，爆炸物的制造，都离不开石油。谁控制了中东石油，谁就有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同时，中东还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最早控制中东石油开采的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控制着亚、非、拉石油资源的百分之九。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非、拉的石油资源至少已有百分之七十五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了。当时有个英国石油银行家爱德华手舞足蹈地说：“英国的地位已经固若金汤。现在除美国本土以外，一切已知的石油产地，一切潜在的和可靠的油田，有的是由英国所掌握，有的在英国管理或控制之下，有的则是由英国的资本所支持。”

正当英国石油巨头洋洋得意的时候，在一旁看得眼红心痒的美国石油垄断财团开始

向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一场英美之间争夺中东石油势力范围的战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拉开了。人们先是从当时的很多美国报刊上看到关于“美国的石油资源很快就要枯竭”的报道，大叫大嚷地宣传所谓“能源危机”。接着，美国国务院就提出中东石油资源要遵守“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要求对美国资本“一视同仁”。美国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等大石油垄断财团就此乘机很快地打进了中东富饶的油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石油事务管理局负责人伊克斯带头刮起了第二次所谓美国发生“能源危机”的阴风。他叫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已经“耗尽了所生产的石油。如果我们要在石油的基础上维护我们的文明，那末就应该准备走向那些丰富的石油地区”。在这一次所谓“能源危机”的幌子背后，美国打算走向哪里去呢？伊克斯接着宣称：“石油的首都已经转移到中东地区，美国最好迅速进入这个地区。”这就是美国决心大力扩张它在中东石油势力的讯号。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断加剧的激烈争夺，英美两国的石油垄断资本最终互换了它们各自在中东地区扮演的角色。一九六九年，美国石油垄断资本在中东的石油投资已达五十多亿美元，占中东地区外国石油投资数的百分之五十六，英国则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四。就中东石油生产量说，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的部分占百分之五十三，而英国仅占百分之三十。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在国外的直接投资总额中，只有百分之三投于中东的石油工业，但它所提供的利润则占美国全部国外直接投资所得利润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七。美国垄断资本从中东石油投资中每年攫取纯利润在十五亿美元以上，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八年利润额累计达一百二十多亿美元，相当于一九六八年美国的黄金储备。美国在中东石油投资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摇钱树。英美在中东地区争夺石油霸权，终于以美国夺得霸主地位而结束了这肮脏的一页。但是，争夺霸权并没有终结。“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随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一场新的争夺中东霸权的激战，又在苏美两霸之间展开了。

## 苏美两霸对中东石油的争夺战

中东邻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中心。苏修从黑海向外侵略扩张，首当其冲的是中东地区。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但欧洲国家石油消费量的百分之八十来自中东。苏修如果控制了中东石油产地和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运输路线，就等于掌握了向欧洲输送石油的开关。正如法国的一家报纸所说，“谁占有石油，谁就能控制世界，特别是控制靠东方提供石油的欧洲。”

苏修竭力控制和掠夺中东石油，也是出于它对石油的长远的战略需要。苏修国内虽然蕴藏大量石油资源，但有百分之八十七的石油蕴藏在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开发利用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正在开采的乌拉尔以西的油井将近枯竭，生产的增长率不断下降，

而石油的消费量却随着疯狂的扩军备战迅速增长,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八,同时每年还要向东欧一些国家输出大量石油。因此,石油供需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九六七年,苏修开始从中东进口石油,当时的进口量仅十万吨;但到一九七二年就剧增为七百五十万吨,一九七三年更增为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吨。据估计,到一九八〇年,苏修需从中东进口石油五千万吨到一亿吨。

追求垄断高额利润是帝国主义的本性。苏修从中东进口一吨石油的价格比国内东部边远地区开采的成本要便宜二十美元;它还通过贱买贵卖的投机手法,转手之间攫取暴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对西方贸易逆差分别为十亿、十一亿美元。到了一九七四年,苏修趁阿拉伯国家对西方一些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禁运石油的机会,高价转手倒卖石油和天然气,结果对西方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估计这项顺差将达十亿到十五亿美元之多。苏修新沙皇并不满足于当“行商”,而且竭力要当“坐商”,为此,它继承老沙皇“南下”扩张战略,大举向中东产油国家渗透,千方百计取代美帝势力,阴谋独霸中东。它在中东大搞什么“军火换石油”、“机器换石油”的同时,还打起“技术合作”、“经“援”、军“援”、“贷款”等旗号,深入中东腹地,到处勘探石油,直接控制油田的开采权。

伊拉克是一个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六十年代末,苏修打着“支持”、“援助”的旗号,大举渗入伊拉克。一九六九年,苏修与伊拉克签订了两个石油协定,分别以七千四百九十万美元和七千七百万美元的贷款和技术“援助”,取得了北鲁迈拉油田和哈尔法油田的开采权。一九七〇年七月,苏修开始在北鲁迈拉油田钻井,一九七一年六月,苏伊又签订了一项北鲁迈拉油田开发“援助”协定。协定规定,伊拉克从一九七二年起用原油偿还苏修的石油贷款。一九七二年四月,苏伊又签订了该油田的第二、第三期的“援建”合同。同时,苏修还“援助”伊拉克设计了摩苏尔炼油厂,并在伊拉克的许多地方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勘探活动。

伊朗的石油工业,曾长期控制在美国垄断资本手里。六十年代以来,苏修也打入了伊朗的石油工业。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八年,苏修向伊朗提供了十一亿美元的“经援”、贷款和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军火贷款。苏修在贷款时规定,伊朗必须以石油、天然气等来偿还。这实际上是一种放“印子钱”的借贷关系。伊朗兴建一条长达一千一百余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从伊朗主要石油产区胡泽斯坦省直达苏伊边境阿斯塔拉。这条管道造价六亿七千八百万美元,每年可输送八十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六十亿立方米供应苏修。一九七三年开始了该管道的第二期工程,完工后可使输送能力提高到一百六十亿立方米,其中一百亿立方米输往苏修。苏修就是拿这些天然气做投机生意,转手倒卖给欧洲而大发横财的。

此外,在埃及西瓦绿洲等地区,在叙利亚东北部,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苏修都打起“经援”和“帮助”勘探、培训技术人员的旗号,竭力插手和控制这些国家的石油勘探和开采。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此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全面地向中东产油国家渗透,比之于那些新老殖民主义的先驱,毫不逊色。难怪西方报刊惊呼,“苏俄觊觎中东石油,酷似大英帝国

卷土重来！”

能不能继续保持对中东石油的霸权地位，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美国统治集团就曾毫不讳言地宣称：“中东对美国和西欧是极关重要的，它不仅因为有石油，而且因为它是非洲的门户和地中海的门户。它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石。”为了遏制苏修的扩张，美国要员接二连三到中东活动，力图抵销苏修的影响。中东局势紧张的根源就是苏美两霸既勾结又争夺。要改变这种局面，只能依靠中东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中东是中东各国人民的中东，不是苏美两霸的中东。现在，中东各国人民正在奋起，“帝国主义的豺狼们应该记住，由他们任意摆布人类命运、任意宰割亚非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阿拉伯国家拿起石油武器开展斗争

帝国主义掠夺中东石油，促使产油国的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大部分土地成为石油租借地，农村破产，农业衰落，居民所需粮食、日用品都得依赖进口。石油生产国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剩余物资的市场。中东石油产量虽然连年飞速增长，但石油加工工业却极不发达，一九七〇年炼油能力仅占石油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二。

中东石油工人受剥削之深，是极为惊人的。美国石油垄断公司在六十年代每年从一个美国石油工人身上剥削约四千七百美元，而从一个科威特石油工人身上每年则要榨取四万美元，科威特石油工人的工资不到美国工人的六分之一。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东的第一天开始，中东人民就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不断地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石油资源的巨大浪潮。一九五一年，伊朗第一个实行了石油国有化，把原来属于英国垄断资本的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成立了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也开展斗争，提高了石油税率。西方石油公司向中东产油国政府交纳的石油税率，在一九五一年以后，一般都提高到占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占资本主义世界石油蕴藏量八分之一的科威特，六十年代初期从西方石油公司收回九千二百六十二平方公里的租借地，交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开发。一九六〇年，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委内瑞拉五个国家建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九七一年，科威特又迫使西方石油公司同意把石油税率从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二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又扩大到包括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卡塔尔、阿布扎比等在内的十五个国家。

中东阿拉伯国家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大增强了阿拉伯国家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力量。

一九七二年，石油生产国掀起了参与石油公司股权的斗争。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布扎比六国经过斗争，取得了阿美石油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权的胜利，取得了在英荷壳牌等几个西方石油公司中，从一九七三年占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起，逐年增加股权到百分之五十一的胜利。

阿拉伯人民的觉醒，动摇着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霸权统治。苏美两霸为了在中东争夺石油资源，剑拔弩张，竭力制造紧张局势，但是，阿拉伯人民反侵略、反霸权的斗争怒火，是不可阻挡的。一九七三年十月，他们毅然冲破了两霸炮制的“不战不和”局面，给予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用石油作武器，开展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石油斗争，给予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以严厉的惩罚。

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开展石油斗争的具体措施是：

(一) 减产。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阿拉伯各产油国将以每月百分之五的比例递减产量。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又决定阿拉伯各产油国立即减产百分之二十五。

(二) 禁运。决定对葡萄牙、罗得西亚、南非和美国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三) 提高石油标价。在减产和禁运的同时，决定提高石油标价(标价是石油公司用以向产油国纳税而制定的一种参考价格)，从每桶(139.07 公斤)美元二元九角九分，平均提高到九元七角四分。一九七四年底石油输出国组织又作出决定，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九月，废除原油标价制，实行单一价格制，进一步限制国际石油公司的利润和哄抬原油售价。

(四) 国有化。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等产油国同西方石油公司进行谈判，决定增加石油开采公司中的本国股权，逐步地实现国有化。例如，科威特一九七三年在开采石油的外国公司中占有股份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四年一月起，科威特政府又接管了美国和英国合资经营的“科威特石油公司”的百分之六十的股权，并且决定不久将宣布全部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沙特阿拉伯决定将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百分之百地收归国有。其他产油国家，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等也在准备采取同类措施。

阿拉伯国家这一以减产、禁运、提价、国有化等为内容的石油斗争，灵得很。它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大震动，苏美两霸尤其惶惶不安。石油提价使阿拉伯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资源的斗争中大大增加了收入。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收入一九七二年不到一百亿美元，一九七三年增加到一百九十三亿美元。据科威特石油和财政部长阿迪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宣布，预计一九七四年将增加到五百亿美元。这对于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经济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互助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

美帝在遭受石油武器的严重打击以后，急急忙忙拼凑一个“石油消费国会议”来谋求抵制之道，企图由石油消费国用增加石油、煤炭产量和节约石油消费的办法，来压迫阿拉伯国家降低石油价格。它甚至发出恫吓，要用武力占领阿拉伯油田。苏修为了独霸中东，更发出所谓阿拉伯石油是“国际财产”的谬论，攻击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资源的斗争是什么“区域主义”、“经济主义”、“反映了集团利益”等等，完全撕下了所谓“发展中国家天然盟友”的伪善面具。

真理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帝国主义发出的叫嚣是毫无道理的。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利用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他们的工业品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价格，残酷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四十四年中，原油价格仅仅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三，而钢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二百三十九，石油工业设备的价格则上涨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六。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三年，阿拉伯国家的原油价格同西方工业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又进一步有所扩大。即使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调整了标价，但是由于西方石油垄断财团借机哄抬汽油价格，消费者所付出的油价也仍然大部分成为这些国家的政府税收和石油公司利润。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英国零售汽油每加仑为八十九点七美分，其中生产、运输、提炼和销售成本只占百分之一点六，石油生产国收入仅占百分之八点一，而英国政府税收则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六，石油公司利润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七。所以，阿拉伯国家提高石油标价，最多不过是使不合理的比价关系初步得到了一些纠正。既然帝国主义可以任意压低石油价格和抬高工业品价格，来剥削阿拉伯人民和掠夺他们的资源，阿拉伯人民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提高石油标价，来抵制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呢？！从一定意义上说来，阿拉伯人民利用石油武器来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作斗争，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 石油斗争的深远意义

石油斗争大大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既然石油可以作为武器来有效地回击帝国主义，那末，对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第三世界来说，也应该而且能够运用其他自然资源作为武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苏美两霸离开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矿产原料，就会陷入绝境。一九六九年，第三世界的矿产品在美国矿产原料进口中，铁矿石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锰矿石占百分之九十一一点九，铝矾土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铜占百分之七十八点二，锡占百分之百。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越来越大量地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矿产原料。苏修官方供认，苏修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非铁金属矿石和精选矿石，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二年间，将增加十一倍之多。仅以非洲为例，苏联现在就要从三十五个国家中进口廉价的铁矿石、木材、钻石，以及大量的热带水果、食品、饮料、服装和棉花。以上的材料表明，帝国主义离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剥削，就活不下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手里。只要敢于斗争，善于运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武器，就一定能够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一个国家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这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巩固的。近年来，第三世界各原料生产国纷纷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在经济领域内展开反对超级大国的剥削和掠夺的斗争。拉美的秘鲁先后把美资国际石油公司的全部财产和控制秘鲁矿业生产百分之三十五的塞罗德帕斯科铜公司收归国有。委内瑞拉把丰富的天然气收归国有，一九七四年二月又把资克里奥尔公司的两片石油租让地收

归国有,还决定在一九八三年以前实现全面的石油国有化。墨西哥、厄瓜多尔等国也在收回石油、硫磺等自然资源方面采取了措施。巴西、加纳、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喀麦隆等可生产国,一九七四年三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可会议上,不顾苏修等消费国的阻挠,毅然提出了将价格提高百分之四十五的要求,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竭力压低原料价格,不断提高工业品价格,从而转嫁经济危机、攫取高额利润的卑劣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石油斗争告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冲破帝国主义的垄断,就必须联合起来,依靠团结的巨大威力。一九七四年三月,巴拿马等拉美七国采取联合行动,成立香蕉出口国联盟,以便为共同保卫香蕉的价格而斗争。圭亚那和牙买加等铝矾土重要生产国也同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一起成立了铝矾土国际协会,明确主张维护民族利益,保卫原料价格。短短一年内,第三世界已成立了七个原料输出国组织,包括铝矾土、铁、汞、油料、食糖、香蕉、肉类等,参加的成员国共四十二个,几乎等于过去十年几个原料输出国组织发展的成员的总和。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召开的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以罕见的勇猛气势,一个个登上讲台,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剥削和掠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揭露和谴责;对苏美两霸蓄意破坏、挑拨第二世界同第三世界以及第三世界内部团结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攻势十分锐利;经过斗争,使大会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在石油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第三世界国家在进一步巩固政治独立的基础上,为捍卫国家主权、保卫自然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方兴未艾,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不利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他们的地盘越来越小了,霸权霸不了啦!这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中蕴藏着极大的潜力。他们人口最多,受苦最深,在摧毁帝国主义的事业中必然能够发挥出巨大的革命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机会主义者在赞美“社会和平”的时候;列宁就对亚洲涌现出来的民族解放运动风暴的新源泉感到极大的兴奋,并认为世界“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半个世纪以来,世界革命形势有了巨大的发展。今天,第三世界的形成和壮大,充分说明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形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属于第三世界。共同的使命,斗争的需要,把我们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不畏强暴,前赴后继,坚持斗争,必将能够彻底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彻底埋葬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



## “小锅菜”里有大方向

陈熙春

在一月十三日《文汇报》上，看到了上钢二厂为革命烧好“小锅菜”的报道。这个厂对小批量、特殊规格的订货，不嫌它们数量小、品种多、要求高，努力搞出了这些急需的产品。

这种为革命烧好“小锅菜”的精神好！

“小锅菜”的特点是“小”，小到甚至只有几斤几两。然而，“小”和“大”是相对的。有些大批量的产品，几千吨，几万吨，可谓“大”矣！可是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全局来看，这毕竟只是一个局部，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小锅菜”。小批量的短线产品，数量虽小，却往往关系到国家重点工程的能否配套，它在全局中的意义可真不小呢！

“小锅菜”的“小”是特殊的小。它技术要求高，要货时间急，是要当场热炒出来的“高级菜”。但上钢二厂的干部和工人“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急国家之所急，想用户之所想，把烧“小锅菜”提高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上来认识。他们在安排好全厂生产的同时，腾出力量组成各种攻关组、试制组，不计斤两，不怕困难，仅去年就生产了二百五十多种特殊规格的钢材。与此同时，他们还发动群众搞出了各种土设备，有的还配套成龙，成为“小锅灶”的作业线。有矛盾才能促进转化。上钢二厂“小锅菜”的品种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道理就在于此。

我们的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首先考虑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是为了利润”有根本上的区别。当然，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产值、利润，但坚决反对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烧“小锅菜”，从局部看可能费时多、成本高、利润低，但却保证了重要项目早日投产和帮助用户降低成本，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举个例子，上钢二厂三车间生产的农用复合钢是制造镰刀的专用钢坯，原来用户厂加工时既费料、又费时。他们组织力量试制成一种新的复合钢材，虽然使生产上增加了一些工序，但使用户厂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零售价格降低百分之四十四，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这笔帐应当如何算？发人深思。

“小锅菜”里有大方向。这个问题对于其他战线上的同志来说，难道不也都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吗？

# 观招牌有感

龚 青

人有人名，物有物名，凡商店也就该有店名。大概因为这是一件太平常的事情吧，平时虽在街上跑来跑去，却是从来不曾去注意过它。不料，最近在经过一家商店时，却见一个十三、四岁的红领巾指着店名问：“爸爸，这是什么字？这么难写！”抬头一看，原来是“江艺”写成了——“江藝”。受了孩子的启发，很想说几句话。

明明是很好写的“艺”字，为啥偏要写成这么复杂的“藝”字？“藝”是“艺”的繁体，对于以往读过几年书的人是无足挂齿的。可是，这对于简化字推广后才读书的青少年和其他人，却是个不小的难题。这部分群众的数量不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日益增多。但是，某些同志却对此视若不见，无动于衷。只要在街上略为留心一下，用繁体字写店名、厂名的实在还真不少。

据说，简化字笔划少，撑不开，写招牌不好看。确实，写字要讲美感，写招牌更应如此。但这毕竟不是第一位的吧。照我想，“辞以达意”，写厂名、店名最重要的也是“达意”，就是要人们对五花八门的工厂商店认得出、记得住。在这个前提下，能写得美一点，固然很好；即使写得不美，也不要紧的；最糟糕的莫过于一味追求美，而用出种种人家看不懂的繁体字、怪字。还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曾经批评那些为了追求美观而将“工”字写成“五”字、“人”字写成“𠂇”字的做法：“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这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一撇一捺见功夫。其实，字体的美与不美，也不完全在于笔划的多和少。笔划最少的字莫过于“一”字。但历来的书法家从没有认为它“不美”而歧视它的，就是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青龙”的王羲之墨迹，其间也自有“一”字的位置。可见，字的美与丑，与笔划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说繁体字美，这只是少数人孤芳自赏而已。至于广大群众，不仅热烈欢迎目前已经颁行的简体字，而且还正在不断涌现出大量自造简化字，反映出他们希望汉字简化再简化的迫切心情。“美”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因人而异。我们的某些同志应该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来端正自己的美学观。

当然，长期养成的习惯不是一朝半夕能改掉的。但从“藝”到“艺”，意义并不在减几个笔划。记得鲁迅曾经沉痛地说过，中国文字的繁难，对于人民大众是“一条高门槛”。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倡导下，推广了简化汉字，使“高门槛”得到了逐步的削低。我们决没有理由恢复这条已被削低了的“高门槛”，尽管这是够繁难的。

关心文字改革，人人有责——这也是个群众观点。



## 西双版纳来信(续完)

吴文虎 姚纪梅

### 农村也是大学(第四封信)

××同志:

当我提起笔来写这封信的时候,上海想来已是秋风飒飒、叶落满地的了。但在这里,炎炎骄阳晒得我们汗流浹背,手中得不断地摇着蒲扇才行。往窗外望去,依然是遍地一片碧绿,常年不落的扶桑花(当地称做吊灯花)以及金兰、紫薇、碧桃等各种花卉含苞吐蕊,竞相争艳。入夜,微风吹来了依兰香的阵阵香味,在花丛树林中还不时传来几声不知名的禽鸟或昆虫的叫鸣声,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伟大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着祖国的边疆,知识青年在祖国边疆农村的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这就是我们两个月来巡礼西双版纳的总印象。

“农村也是大学”,这是周总理对朱克家同志谈话时所提出的勉励。当朱克家同志把这句话传达到知识青年中去后,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进一步坚定了青年们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走上山下乡道路这一伟大指示的决心。青年们畅谈上山下乡的收获,说:“在农村的四、五年比起学校的四、五年,收获不知大多少倍。农村的确是个大学。”我们最近去东风农场七分场卫生所访问中获得的印象,进一步证实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这个卫生所在近半年中,由函授学员自己动手为三个病人割除了阑尾,为四个女职工结扎了输卵管,手术状况基本良好。当我们穿戴好洁白的衣、帽和口罩进入一个十平方的、消毒严格的简易手术室后,看到七个“医防”函授学员正在紧张地做手术。“主治医师”是一位二十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左锋,他在五年前刚来农场时,边疆缺医少药的状况促使他发愤学医,经过当地卫生学校的培养后,他胆大而细心地为一个患阑尾炎的知识青年成功地做了第一个手术。函授大学举办后,他既是学员又当辅导教师。“助理医师”是卫生所的负责人、上海知识青年唐锦明,他屏息静气地在传递着手术剪刀、钳子。小唐是一九七〇年在上海黄浦区新风中学报名到这里来的。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多少卫生知识,到了农村后才懂得学医的迫切性。他边实践边学习,内、外、妇、牙、小儿各科样样学。我们在和分场“医防”函授小组的十四位学员座谈中,了解到他们每周一次,共同研究医疗实践中

遇到的疑难杂症，能者为师，半年来学习了十几种常见病的防治方法，做了大量宣传和预防疾病的工作，为本地区的小学生普查了体格，还动了不少手术。

对这个小小卫生所访问，使我感慨地想起了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旧的医科大学学生在念了长长的七年书毕业后，往往一时还不能独立动手术。而当他掌握了开刀手术后，这一把刀往往又成了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本钱，很少有人愿意到穷山僻壤来为贫下中农服务。现今，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青年在农村大学里锻炼后迸发出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们能够做旧大学毕业生所做不到的事情，七分场卫生所的例子不是很有说服力吗？！

农村也是大学，它能够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在劲捧农场核心组组长、上海知识青年、马列函授学员葛小兵的身上看得很清楚。她曾在和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回忆了六年前刚下来时的情景，说：“那时，我刚从城市中学毕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连个小手帕也是家里人帮我洗的。进农场后，开荒，造房子，栽胶苗，种稻谷、蔬菜，付出了很大代价，才在党支部的教育和同志们帮助下闯过了生活关和劳动关，在向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树立了热爱边疆、建设边疆的思想感情。”她继续说：“扎根边疆不是一帆风顺的，时间长了，怕艰苦的思想有时又会冒头。这时，我就想起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走上山下乡道路的伟大指示，想到了和我朝夕相处的老干部和老职工，革命干劲也就来啦！我们场长的决心可大呢，他带头白天夜晚地干，在全场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老职工们决心艰苦奋斗一辈子，他们中有的人九年来没有去过劲腊县城，日夜为改变农场面貌而奋战。因此，当我父亲设法要我离开边疆去上学时，我断然地拒绝了。”“我体会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在乡村战斗，这是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但是，走毛主席指引的这条道路决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和旧的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要经历艰苦的斗争，只有敢于斗争才能胜利。”

葛小兵的成长过程，使我看到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在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千百万革命青年的成长。边疆的函授大学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由州党委统一领导，依靠各级党组织、各个部门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在这方面，动人的事例是很多的。橄榄坝农场党委副书记杨绍基，尽管体弱多病，工作繁忙，但却亲自主持函授大学的开学，热情洋溢地鼓励青年们学习。当参加马列面授班的青年回场后，老杨积极支持他们自己动手办短训班，甚至当他因公调回部队时，在临别前仍在为青年们设计明年函授学习的蓝图。上海赴云南学习慰问团也能认真协助当地党委办好函授大学，为知识青年的学习、成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劲捧农场的慰问团员谢桂凤，不顾水土不服、皮肤发炎等困难，为了搞好函授大学的工作，整天从这个队走到那个队去了解情况，当地发现了十一分场的“电工”组学得生动活泼的经验后，就立即加以总结推广。她配合农场党委召开了三次辅导教师会议，二次联络员会议，努力宣传先进典型，积极推动农场函授工作的顺利进行。为知识青年举办的函授大学，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大学”，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马列科目，得到了各级宣传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写作科目，得到了各级报道组包括西双版纳州报的关心和支持；农村电工科目，得到了各

级工业、供电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医防科目，得到了各级卫生部门包括医院的关心和支持。热带作物研究所为了培养知识青年，也准备从一九七五年起为函授大学开设橡胶科目。他们都派出了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同志兼任辅导教师，而边疆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党组织则是积极扶植新苗成长的辛勤园艺管理者。

边疆知识青年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朝气蓬勃的思想面貌，促进了上海高校教师的思想革命化和高校的教育革命。许多函授教师当迈开双腿走到边疆农村去后，思想感情开始起了巨大的变化。远隔万里的上海高校中的不少同志，对这一工作作出了应有的努力。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组为了搞好边疆的函授教学，把仅有的两台显微幻灯观察仪带去了一台，老工人还精心设计标本箱，连夜赶制有机玻璃的病理标本，使许多解剖标本能经得起长途跋涉的颠簸。正是在他们的精心准备下，这次医防函授组带了三百多张幻灯片，四十多件标本，十五、六具模型，运抵目的地后全部完好无损。

新型的边疆函授大学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出现，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我手边正好放着姚纪梅同志回上海后的来信，信中谈到了他和香港高速函授学校校长冯明之先生的谈话。在姚纪梅同志介绍了新中国函授大学的情况后，冯先生特别关心地询问学员的学习费用，教师的报酬以及结业后的资格和文凭等。这些问题在我们来说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但却使这位香港来客发生了无限的感慨。他频频地点着头，一再表示：你们的办法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办得到。在香港，在资本主义世界，不收费怎么能办学？不给报酬有谁来担任教师？不发文凭又有谁来念函授学校？他又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函授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函授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路子，你们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他还表示：他尽管无法照样去做，但他一定要在明年由联合国在日本召开的函授会议上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函授。这一席话，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已经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修叛徒集团，为了腐蚀苏联人民的灵魂，也在举办什么函授神学的科目。这些叛徒们已经连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也都丢得一干二净，和这里的新函授恰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信写完了。我深深地为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感到自豪，为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成长而感到自豪。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新型的函授教育制度有着光辉灿烂的明天，它正在谱写着革命史诗的新篇章。

此致

革命敬礼

吴文虎

一九七四年×月×日

编后附记：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完了这组西双版纳来信后，不知有何感想？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每月每日有多少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出来呵！就拿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来说，它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呢？我们希望各条战线上的同志拿起笔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宣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写出尖锐泼辣而又有分析的好文章。本刊欢迎这样的来稿。



◆  
一 九 七 五 年

◆  
第 二 期

◆  
总 第 十 八 期  
◆

XUEX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代号: 4-192

定价: 0.25元